

記憶

REMEMBRANCE



2008年9月13日创刊 2017年7月31日第12期 总第190期
汇聚研究成果 提供学术资讯 建立交流平台 推动文史研究

《记忆》190期

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十）

目 录

【专 稿】

- 唐 利 要批判文革余毒，不要继续派性论战 2

- 陈子明 林爻 评胡拾音的文革思维 6

【评 论】

- 谢甲林 北大保卫组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与舒声和郑实商榷 16

- 俞小平 事实与逻辑——就北大武斗答宫香政同学 23

- 艾 群 答宫香政同学的质疑 48

【读 书】

- 舒 声 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 53

- 吴根耀 人民的文革，还是被文革愚弄和诱惑的民众？
——与王复兴学兄商榷（节选） 61

【述往】

- 吴 琪 难忘的燕园·1969（五）——别了，燕园 65

- 陆伟国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七）——家乡上海 69

- 宋翔雁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一）——我被隔离审查 72

- 鸣 谢：本期封面照片选自“李振盛摄影集”

【本刊声明】

【专稿】

要批判文革余毒，不要继续派性论战

唐利

北大校友胡拾音的近作“北大井冈山兵团真的和王，关，戚没有关系吗？”，题目不仅有标题党吸人眼球的味道，还透着一种文革气息，要翻出老账，重开早已偃旗息鼓派性论战。

北大文革中打了近两年的派仗，反聂的井冈山兵团说聂元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聂元梓一方则说井冈山是反动组织。既然是反动组织，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残酷无情，聂元梓的武力镇压，经济封锁，断水断电就有了合理性。在其他单位，一般的两派，观点再对立，也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只不过都自称“造反派”，互相攻击对方为“保守派”，北大则不同，聂元梓是一面文革大旗，一手遮天，有人撑腰，反对她就要定为“反动组织”。她敢这么做，也是看了“无产阶级司令”的大员们的脸色，包括曾经在台上的王，关，戚，没有一个正话提过井冈山正眼看过井冈山的，三天两头接见“革命群众组织”头头，没井冈山的份，这个组织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矮人一等，生存艰难。只有一个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劝聂接受井冈山是“革命群众组织”，便于她来领导，但得到的回答是一个NO。

当时要定反动组织，或者它的头头有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或者与黑线人物有关联，有黑后台。找证据，就是以胡宗式为首的动态组的活了。因为在夹缝中生存，井冈山的头头们都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就算鸡蛋里挑骨头，前一条除了捕风捉影就是生拉硬扯。后一条“黑后台”，井冈山攀不上高枝，只是原北大被打倒的各级干部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大批参加或支持，许多人被当作“黑手”为井冈山吃了不少苦头。

现在看来，井冈山作为一派群众组织，前面加不加“革命”，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年，没有这个名分，头上悬着“反动组织”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确实使几千名这个组织的师生生活在恐惧之中。聂元梓搞“文攻武吓”，武吓是武力围剿，文攻就是用对“反动组织”秋后算账的大棒逼井冈山同学“下山”。文革结束了，幸亏没有按照聂的意愿，否则成千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会被流放，被迫害，重演57年右派分子的悲剧。聂本人倒是被送上了审判台，判了大刑，进了大牢。当然这个结果并不是井冈山的胜利，而是正义的胜利，法治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聂元梓当红那几年写下了北大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庆幸的是，将来北大学子回顾时，不仅看到阴云密布，也能听到正义的呼唤，善良的声音。

本来，经过五十年的时间沉淀，当时亲历那场浩劫的同学们，现在已经放弃了派性恩怨，重温同窗之情，着眼现实，这正是摒弃政治的，派性的，利益的因素，从学术的，历史的角度，心平气和地梳理过去事件良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北大那段校史不该成为空白一帶而过。可是，胡拾音同学，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功夫却放在了为聂元梓翻案，放在了继续考证井冈山是被坏人操纵的坏组织，放在了纠缠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陈年琐事，执着地不肯走出文革，把写回忆当成继续派斗的机会。

当然，文革回忆没有禁区，任何的课题都可以讨论，搞清史实，反思教训，给北大文革史增砖添瓦，为后人后代留下史料。但是，胡拾音同学出了一个貌似爆料的题目，加了问号之后，洋洋洒洒，不知所云，唯一的所谓“干货”就是，井冈山的一些负责人，见过王关戚的”爪牙“（吴传启）的”爪牙“洪涛，刘X，王恩宇，仅此而已！剩下全是东拉西扯，谭厚兰如何如何，谢富治如何如何，。。。跟题目八竿子打不着，我也懒得关注。这种标题党不严谨，不认真的态度，害得想了解实情的人们白费了时间。

结果，读了胡文，我反而得出结论，就算井冈山头头和洪，刘，王有接触，和王，关，戚也一点关系看不出啊。其实作者本人也很心虚，看看没有证据，笔锋一转，大讲起虽然王关戚没有直接说过支持井冈山，但是从立场上站队上看，两者是一致的。这又是典型的文革思维，文革逻辑了，让人想起那时以人划线，流行”站队站错了，一切都错了“。井

冈山一方当然需要反思，需要总结教训，需要深刻认识北大文革给国家，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但是，如果按照胡同学的指引，去追究头头们和洪，刘，王说了什么话，去研究井冈山与王关戚关系这个伪命题，那就走偏了路，和胡同学一起陷入文革思维。而且，按照胡同学的逻辑，聂元梓是站队站对了，那是那一边？无非是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

问题还不仅在这里，而在于作者思维方法，推理方法，抓住一句话，一件事，任意夸大，无限上纲，戴上大帽子。通过顺蔓摸瓜，把井冈山从一些小人物联系到王关戚这样的“大人物”，这种把人打入“黑线”，搞株连九族，进而置于死地的做法，在文革中太常见，太普遍了。一个人只要沾上了黑帮人物的边，哪怕是生拉硬扯的，扑风捉影的，都将打翻在地，身败名裂，万世不劫。两派混战时，挖空心思地“揭老底”，也都是把对方往黑线上推。这样的政治斗争的方法正是我们要批判的文革遗毒，这样造成的悲剧正是我们要永远避免的，怎么能堂而皇之继续使用，又拿来攻击曾经的对立派同学呢？虽然胡拾音同学没有再用“反动组织”这一提法，他的用意是很明显的，用“抹黑”不过分吧。

在我看来，至今还要为两派当年的争论的话题判个对错高下已经没有意义。把抓“黑手”来抹黑对方作为研究方向也与时代强烈脱节，更是谬矣。退一万步，就算拿出一个王关戚直接影响了井冈山的过硬材料，北大文革的性质，不会因此有任何改变，对原井冈山的同学也毫发无损，不会耸人听闻，没有人在乎，就是原新北大公社的同学，也不会有多少人有兴趣。人生精力有限，钻这个牛角尖那是可惜了才能，枉费了心机。文革研究不是搞文革继续，文革回忆不是要重开派战，把对方组织重新打入地狱。如果非要抓黑手，聂元梓背后的在高校里最多最大，而北大井冈山倒是最经得起查，最干净的。文革中小报胡同学没看过的还很多，说不定还有你以为隐藏的惊天秘密，去查吧。

我脑海里这时出现了一个人：“悲惨世界”里那位阴森冷酷铁石心肠的沙威。他认准冉阿让是一名罪犯，在星空下宣誓永不放弃，穷追不舍，用毕生的精力，千方百计要捉拿归案。五十年前的文革罪恶之一，就是造就了一批沙威式的人物，他们是一批鹰犬，信仰

就是整人，津津乐道于把别人，别的组织打成反动，收拾迫害，无所不用其极。北大有一些同学，当年做过这类事，年轻不成熟，尚可原谅，后来没有公开道歉，也不必再追究，但是而眼前胡同学，竟然时隔五十年，依然念念不忘把对方打成黑手操纵的初衷，找证据，苦思想，寻关联，这样的执着，一根筋，是进入了邪路，干扰了清算文革罪恶的方向，我们不能不批评几句，回应一下了。

胡拾音的文章还有一个目的，如果证明了王关戚是井冈山的后台，聂元梓反井冈山等于反王关戚，聂元梓在文革中就站对了队，就可以翻案了。这种推理的不靠谱，这种逻辑的可悲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一些人也写过文章，谈聂元梓如何反潘梓年吴传启有功，目的是证明她反人反对了，对文化革命有贡献，对中央文革忠心耿耿，站在了正确路线。聂元梓与潘吴之间的恩恩怨怨，陈芝麻烂谷子，本人了解不多，双方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干将，为争宠也好，观点不同也罢，并无是非对错之分。聂元梓可以夸耀自己揭发潘吴结党营私，是对中央文革有贡献，潘吴也可以夸耀抵制中央文革身边的野心家而有功啊。反对潘吴，真也好假也好，内讧而已，成不了聂元梓翻案的救命稻草，一根绳上的蚂蚱，聂元梓倒显得为了自救，不大厚道了。

聂元梓，王关戚，都是文革前的普通干部，靠文革暴发起家，爬上权力顶峰，叱咤风云，又先后被毛所抛弃。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至今（或至死）不肯认识自己的错误，不肯反思文革的罪恶，受了打击也不屈不挠。当前在中国，有一股不小的为文革招魂，为文革唱赞歌的势力，聂元梓，蒯大富等人就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扎堆取暖，不消停，可以称为文革遗民，文革余孽。他们中的大多数，主要精力是为自己鸣冤叫屈，抱怨不平，甚至评功摆好，企图影响社会，影响上层，影响后辈。胡拾音等人在这里属于则站得高，比较无私的，他们不为自己（也许表面的？），而是一心一意替知遇之恩的聂元梓说话，热衷于继续文革旧案的辩论，继续用文革的标准定是非，继续完成文革未竟的事业，似乎有着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真是已经把文革思想融入灵魂，把文革精神化为血液了。

当然，聂元梓要翻案，别人要为她翻案，也有你们的自由。不过，聂的命运是和文革紧紧绑在一起的，要翻案，像胡拾音同学这样小打小闹，在枝节问题上零敲碎打绝对不可能奏效，掀不起任何风浪，根本出路就是推翻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论证它好得很，必要的很，还要继续搞，胡拾音同学可以考虑一下，完成这样的艰巨任务，自己有几分把握。

其实我更想说的是：醒醒吧，文革回不去了，文革那一套方法那一套思维不灵了。完全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反思文革的罪行和恶果，走上民主宪政的光明大道，才是正途。■

【专稿】

评胡拾音的文革思维

陈子明 林爻

网刊《记忆》第185期北京高校文革研究专辑（九），刊载北大校友胡拾音《北大井冈山兵团和王、关、戚真的没有关系吗？》，以下简称《胡文》。《胡文》全文11100余字，用了60多个问号，可谓充满疑问。

《胡文》针对《记忆》第172期陈子明、林爻的文章《北大文革两派分裂，源自人心向背》，挑出文中一句话，展开了涉笔甚广的论述。这句话是“‘王关戚’和‘团零飘井红’没有交集，没有打过交道。‘王关戚’和‘北大井冈山’没有交集，没打过交道，一毛钱的关系也没有！”

一、《胡文》质疑陈子明、林爻文革期间的身份

《胡文》问道：“请问，你们是井冈山兵团及其前身‘团零飘井红’的领导人吗？如果不是，你们怎么就能断言‘没有打过交道？’你们知道自己领导人的行踪吗？”

这个问题，笔者在拙作《北大井冈山兵团和王、关、戚真的没有关系》一文中，作了据实回答，希望《胡文》作者能够及时看到。

二、关于《传单》附图，提一点意见

《胡文》说自己，“偶然获得当年北大井冈山兵团的一份传单（定价2分），传单的通栏大标题是‘聂氏家族的复灭和聂元梓的前途’，作者是‘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飘红旗战斗队’。”

笔者先议论几句这份《传单》的图片。《胡文》唯一的附图，《胡文》记作“图一”，图片质量太差，通栏大标题“聂氏家族的复灭和聂元梓的前途”在《胡文》提示下，依稀可辨。其他的文字模糊一片，我等一般读者无法阅读，也无法辨识。网刊《记忆》读者甚众，但凡看到《胡文》，大概都能感觉到附图质量之低劣。《胡文》附图白白占用了版面，提供不了信息，当然更不符合作为书证“来路明、出处清”的起码要求。读者们无法比对阅读原件文字，那么，只能听凭作者任意扯谈了。所以笔者认为《胡文》附图质量低劣，没有证明力，白费了。

既然是说话，就要把话说透彻，不要含着骨头露着肉；既然是插图，就要把图弄清晰，让人看清楚，不要搞雾里看花。

三、关于《胡文》所言《传单》的时间

关锋、王力、戚本禹属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力协助毛泽东推进“文革”的干将，是“文革”推波助澜、红极一时的人物。他们善于揣摸上意、顺杆爬。1967年春，中共几位老帅重臣聚众发出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言论，毛泽东听报，震怒，立即发起批“二月逆流”，责令几位老帅重臣“停职检查”。

1967年武汉“七·二〇事件”东湖宾馆被围，毛泽东乘飞机仓促走避。7月25日天安门

举行盛大的欢迎王力大会。“新华社 25 日讯”，即关于北京百万人集会的报道，其中“坚决打倒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措辞，是关锋加上去、康生审定的，康生说他“请示了主席”。

王、关、戚等自以为嗅出领袖意图，以为领袖要打倒一些军内人物，就炮制了一篇“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章发表在《红旗》杂志上。领袖看了以后，龙颜大怒，狠狠地把杂志摔在地上，说是坏文章。还说，“还我长城”。其实，玩弄权术，简在帝心。为了军队和官僚机构的权力平衡，干犯“揪军内一小撮”的王力、关锋被领袖抛出，成为“政治时局”的替罪羊。这样，“中央文革”红得发紫的人物王力、关锋就被送去隔离和牢狱，时间是 1967 年 8 月 30 日。

关于这份《传单》的时间，《胡文》第一个说法，“原件无出版日期，根据内容推断，应该是 1967 年 12 月中旬出版的。”《胡文》第二个说法，“传单出版之时，关锋、王力已垮台¹，戚本禹时日无多。”王力、关锋 1967 年 8 月 30 日被隔离审查，1968 年 1 月 12 日，戚本禹被隔离审查。《胡文》第一个说法的时间范围，落在第二个时间范围之内，并不相悖，惟《胡文》不能写出准确的日期，也就难以苛求了。

四、关于《胡文》所言“为什么对聂元梓要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

《胡文》说《传单》上有一篇文章——《评聂元梓谣言攻势的政治背景》。文章里有这样

¹渔歌子《1967 年毛泽东为何抛出“王关戚”》，原载《文革博物馆通讯(一四〇)》增刊第 303 期，2002 年 8 月 19 日。
“外交部反对王力一派的刘华秋和王海容等急于了解毛泽东的态度，便在 9 月 24 日凌晨毛泽东刚回到北京时，由守候在中南海的王海容去向毛泽东汇报王力“八七讲话”在外交部如何不得人心，想探听毛泽东的态度，而毛泽东却只吟出了两句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曲折地反映毛泽东对于抛出王、关、戚的无奈心境。”诗句所表达出来的对王、关、戚的感情，与毛泽东“九七批示”是一致的。他并未将王、关、戚归入应被打倒的敌人之列，而只是迫于当时的某种形势，不得不抛出他们来作牺牲，以求得政治上的平衡。他这个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大“英雄”，有时候也不得不受“时运”的制约，他也常常是“不自由”的。

一段话：“社会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政治事变：聂真被捕了！聂元素被捕了！郑家店倒闭了！周达甫完蛋了！”《胡文》诠释：“聂真是聂元梓的哥哥，聂元素是聂元梓的姐姐。郑家店是指郑公盾和郑仲兵父子。周达甫是民族学院的教授，其妻子为北大俄语系教员，与聂元梓曾住在一栋楼。就因为亲属和邻居等关系，就把他们和聂元梓联系起来。他们和聂元梓在北大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当时这些人被捕的原因各异，他们几个人后来都没有问题。”

文革期间的“专政机关依法逮捕”（校刊《新北大》语，见本文附图1）聂真、聂元素、郑公盾、郑仲兵、周达甫这些人。是北大井冈山兵团抓捕、扭送他们的吗？不是！是《胡文》诬指为北大井冈山兵团“有割不断关系”的“王关戚”吗，《胡文》也不曾指出。既然他们的被捕，跟北大井冈山兵团毫不相干，那么，《胡文》干嘛那么激愤填膺、大抱不平，时至今日，还要咀嚼“聂氏家族”这个“烂绳头”、问难于八竿子够不着的陈子明、林爻呢。

另一方面要看到，文革期间，北大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抓捕、扭送“专政机关”的，何止数十人；被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群众专政”的干部、教师、职工、学生，达到数百人，



其中活活打死三人，迫害而死三十余人，致伤致残上百人。文革校刊《新北大》仅仅 1968 年 5 月 23 日第四版署名“新北大公社红旗兵团”通栏标题《北大井冈山反革命分子的大本营——从专政机关依法逮捕的反革命分子看老保组织井冈山兵团》（见左图），大呼小叫、点名道姓的就有：谢世扬、胡伯安、胡根初、王海、王培英、何维凌、胡定国、苏士文、余水荣、臧希文、王晓秋、杨作森、乔兼武、魏秀芬、赵长占、杨勋、杨炳章、刘立炎、范永奇，十九个人。其按语：“无产阶级司令部明确指出：北大井冈山兵团中有一个反动小集团。两年来，新北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现已查明，北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的反革命分子中，几乎全部是井冈山兵团成员，或是投靠井冈山兵团的反革命分子。老保组织北大井冈山兵团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的大本营。”

笔者提供《新北大》这篇文章的清晰图片，供给读者参详。取《胡文》一句话，同样要说“当时这些人被捕的原因各异，他们十几个人后来都没有问题。”

据笔者所知，这十九个人，几乎全部是“红色政权”校文革的“二组”向“专政机关”报送材料陷害，而被抓捕，甚至是校文革-新北大公社直接“扭送专政机关”的。其中绝大部分人（如何维凌、胡定国、苏士文、杨作森、乔兼武、魏秀芬、杨勋、杨炳章）入狱时间远在北大井冈山兵团成立之前，跟北大井冈山兵团毫无关系，都被《新北大》用“投靠”这个词儿强拉硬扯到井冈山兵团头上。

笔者坚信“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飘红旗战斗队”没有权势、不曾向“专政机关”报送材料抓捕，更不曾把聂真、聂元素、郑公盾、郑仲兵、周达甫诸人“扭送专政机关”。所以，笔者认为，即便真有所谓《传单》，即便《胡文》所说“新北大井冈山兵团飘红旗战斗队”真的在《传单》中写了这篇《评聂元梓谣言攻势的政治背景》，即便该文真是对于聂真、聂元素、郑公盾、郑仲兵、周达甫诸人的被捕表示第三者的幸灾乐祸，那也不过是闹派性的时势下，民间谚语“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拳”罢了。更何况后来，1968年7月28日，人民大会堂的“召见会议”上，“最高指示”说：“人家说你哥哥也不好，姐姐也不好，你这个聂家就是不好。”《胡文》愿意咀嚼“烂绳头”，那就咀嚼咀嚼这句“最高指示”吧。聂家的人是人，被聂元梓校文革及其附庸迫害的几百北大人也是人！可否移一点儿激愤、不平给这些受害人呢。

《胡文》问道，“为什么对聂元梓要有如此的深仇大恨呢？哪些人和哪些势力对聂元梓这么仇恨呢？”笔者认为《胡文》问得好。

举凡反思、总结“文革”文章、著作，撰述“文革历史”，几乎没有不提到“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试着举几个例子，略表一二：

文革史家席宣、金春明合编的《文化大革命简史》89页说：

5月25日，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等7人贴出一张诬陷、攻击中共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大字报是由康生派人授意写成的，目的是“在北大点火，往上搞”。大字报对中共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提出的在运动中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坚持讲道理’。‘从理论上驳倒他们’等要求横加指责，硬说这是“压制群众革命”的清规戒律，‘是十足的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号召“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战斗的时候了，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文革史家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21页说：

毛泽东下令，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聂元梓的大字报。

六月一日晚八时正，在各地广播电台连播节目里，播放了聂元梓大字报的全文。

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的通栏标题，刊登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全文。同时，发表了陈伯达参与炮制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把陆平、彭珮云等领导的北京大学称为“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说，陆平等人所代表的组织是反党集团。

就毛泽东在中国的影响和威信而言，评论员的这一席话，足以大大的打动中国人民的心弦。

在《人民日报》的煽动下，全国的运动哄然而起。几天时间，千千万万封声援聂元梓的信件和电报，象雪片似地从中国四面八方飞进北京大学。全国各地报刊连连登载工农兵学商各界人士支持聂元梓大字报的文章。

北京大学顿时成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中心。五颜六色的大字报布满校园，首都各个学校、机关、工矿、企业单位的成千上万群众涌向北京大学去声援聂元梓。北大人山人海。于是乎，聂元梓成了显要的新闻人物。她每到一处，必定被数以千百计的敬慕者簇拥着，每个到北大的人都渴望着亲耳聆听聂元梓对文化大革命的高见，想看看这位突然成为“传奇式人

物”到底长的是什么模样。为了更大地激发去北大群众与本单位党委斗争的情绪，还特地在聂元梓等人张贴大字报的地方，用桌子搭了一个讲坛，各单位群众排成一字长蛇阵，争先恐后地跳上桌子发言，表示对聂元梓的支持；表达与“当权派”斗争，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在北大的带动下，北京的五十五所大专院校和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及普通中学掀起了揪斗党委第一、二把手的浪潮。各个学校里都布满了大字报，正常教学秩序被打乱了。学生们像是找不到头羊、咩咩乱叫着的羊群，真有点没人控制得了局面的势头。然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他在一个月后的一次讲话中说：“六一”公布大字报就考虑到非如此不可，文化大革命就非要靠他们去做，不靠他们靠谁？”

文革史家王年一《大动乱年代》19页说：

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为之震动。毛泽东1967年2月3日同卡博、巴卢库谈话时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到6月1日中午我才看到，我就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我说要广播。”毛泽东为什么要专断地支持造反大字报呢？他要天下大乱。他在6月1日对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写了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6月1日下午4时从杭州传给康生、陈伯达的，就是这个批语。广播这张大字报不仅使北大师生感到意外，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也感到意外非常。他去询问周恩来，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周恩来说：“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而康生6月2日在北大30楼和32楼之间的空场上，向师生讲演：“大字报一广播，聂元梓解放了，我也解放了！”聂元梓同她的伙伴弹冠相庆，北大广大师生不了解背景，愤愤不平。

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把无可非议的“加强领导”说成“负隅顽抗”，把无可指责的“坚守岗位”说成“坚守的是他们多年来一

直盘踞的反动堡垒”，如此等等。评论员文章武断地宣称：“为陆平、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文章又语意双关地说：“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了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彻底摧毁。”

6月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社论说：“你是真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假赞成社会主义革命，还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要在怎样对待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这个问题表现出来。”

6月4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6月3日电讯：“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同志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调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同志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李雪峰、吴德两同志业已到职工作。北京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新市委直接领导。”同日又刊载新华社6月3日电讯《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中共新改组的北京市委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二）撤销中共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这个电讯的送审稿经毛泽东阅过，他表示同意。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社论说：“陆平等这一小撮保皇党，拚命抵制和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对一批积极分子进行的这种残酷斗争，竟长达7个月之久。这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这里所说的“积极分子”，就是包括聂元梓在内的、在四清中否定北大校党委的积极分子。“残酷斗争”云云，都是夸大其辞。

中共北京市委6月3日决定：“撤销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的一切职务。”

6月1日以来发生的一切，惊心动魄。影响最大的，是中央电台和报纸肯定了聂元梓等人的造反大字报。《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造党委的反，号召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十分引人注目。康生1966年9月8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京串连者时说：“这张大字报不仅是揭开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而是点起了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聂元梓1966年8月2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华北组会议上说：“毛主席在全国公布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这天北京大学爆炸了！北京城爆炸了！全国也爆炸了！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高潮。”

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

全国大中学校的动乱，就是在6月1日晚以后出现的。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说：

1966年7月24日晚20时30分，毛泽东继续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及部分大区书记谈话，北京市委书记吴德也参加了。

毛泽东先让李雪峰汇报北京的运动情况，当李雪峰说到“北京大学七个人的大字报，现在七个人有分裂”时，毛泽东插话：

“分裂怕什么？世界万物都要有分裂！不在聂元梓这个人有缺点，这是政治，她打了第一枪。”

笔者认为，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文化、反人类的罪恶政治运动，“文革”荼毒生灵、摧残文化，聂元梓“打了第一枪”，她当然有罪，而且罪不可逭。《胡文》问，“哪些人和哪些势力对聂元梓这么仇恨”，笔者认为亿兆“文革”受害者、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对聂元梓这个历史罪人无比痛恨。

《胡文》说：“关锋、王力的垮台和即将到来的戚本禹的垮台，非但没有解决王、关、戚等人搞极‘左’和结党营私给文革造成的破坏问题，没有改善文革两派恶斗的政治生态，

相反，文革的形势实际上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更加恶化。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这个问题，显然不是笔者能够说得清楚的。”笔者认为，“文革”是中共的极左作为，是历史犯罪，始作俑者是最大的极左，是罪魁祸首。只有至今站在“文革正确、必要、及时”立场上的人，拥护“文革”、坚持“文革”的“鸟有之乡”一类的人物，才会流露“给文革造成的破坏”、“没有改善文革两派恶斗的政治生态”之类的遗恨，怀抱“为文革正名、为我正名”的妄念。《胡文》作者，加上另一位常在博文和网刊发表东西的胡先生，庶几是拥护“文革”、坚持



文革”、江青恶势力和“红色政权”的权柄，费尽心机、费劲气力，文宣诬陷之外，不惜大搞绑架、酷刑、武斗、杀人种种暴力手段，强指“井冈山兵团”为“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王关戚和杨余傅，后台一个个倒了”（见上图：1968年7月26日《新北大》第三版《操纵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抗中央文革必须坚决镇压》）。不顾事实，给“井冈山兵团”扣上“王关戚支持”的企图，都不光彩地失败了。相反，聂元梓校文革的“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铁帽子摘不掉！聂元梓是历史罪人，铁案翻不了！今天还在沿用“文革”思维、“文革”语言，妄图地给“井冈山兵团”扣上“与王关戚有关系”，不仅徒劳无功，反倒招有识者嗤笑。 ■

“文革”的人物；明知“不是笔者能够说得清楚的”，还要强说，无非是他们“文革”思维乃至“文革”立场决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笔者还要说，北大“文革”期间，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花开花谢，总共一年时间。聂元梓校文革及其附庸，依仗“中央

主义，实质上都是右。他们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右派。

操纵老谋北大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这些货色，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们在刘邓陶、谭震林、王关戚和杨余傅那里就屡见不鲜了。一切反对中央文革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过去被某些人视为大忠臣的刘邓陶是如此，他们的小同志王关戚、杨余傅也是如此。今天操纵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小集团比被我们痛斥此次无产阶级革命派破坏了：简直是快人心。

让这些决心带着花岗岩胸章去见上帝的人去咒骂吧，我们革命人民正是在除掉敌人对中央文革的咒骂声中，更加信服、更加拥护中央文革的。谁反对中央文革，谁就是反对以毛泽东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谁就是否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把他们统统揪出来，斗倒斗臭，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警死保卫中央文革！

操纵井冈山兵团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反抗中央文革罪该万死！

新北大公社 红旗

【评论】

北大保卫组在文革中都做了什么

——兼答舒声和郑实商榷

谢甲林

最近，北大校友寄给我两篇公开发表的文章：一是2016年8月郑实在《燕园风云录》（四）发表的《他们为什么要整学生——从工作组、校文革到宣传队的一脉相承》（以下简称“郑文”）；二是2016年11月15日舒声在《记忆》第174期上发表的《北大校文革二组整了哪些“黑材料”？》（以下简称“舒文”）。这两篇文章所依据的材料是1967年7月26日出版的《新北大报》刊登的《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的谎言》，这篇文章是否可信，请容我细表。

我是1945年4月参加革命，1950年3月入党的干部。1958年于北大法律系毕业后，被抽调到党委书记、校长陆平直接领导的“马列主义研究室”哲学组任政治理论教员。1960年，该室并入哲学系。1963年3月，我奉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一厅做批捕、起诉、出庭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6年6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主管人事工作的党委书记李放，通知我说：“中共中央组织部给最高检察院来函通知要谢甲林去北京大学作保卫工作。”我说：“服从组织，要求不要留在北大。”

1966年6月22日，我到北大工作组报到。先是分配我和另一人到图书馆负责领导“文化大革命”。在图书馆工作了几天后，工作组副组长、中组部副部长杨以希把我调离图书馆，让我到二组（保卫组）任副组长。组长蔡润田是海军保卫部副部长，组员36人，都是海军保卫部干部。在燕南园63号和66号办公、住宿，主要承担：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来北大时的安全；周总理确定的6名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安全；北大师生和外校师生以及社会各界到北大看大字报和大串连的人身安全；维护北大的治安，保护北大财产

的安全；自行或协助北京卫戍区和公安局，上报和侦破反革命案件；其他刑事案件和自杀案件的勘查、处理工作。

1966年8月4日，中央文革宣布撤销北大工作组，在大会上，聂元梓请求，中央文革批准，万人大会通过，宣布留下二组原班人马，继续承担北大的安全保卫工作。校文革成立后，二组改称保卫组，由抗战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北大人事处副处长、校文革第一副主任白晨曦主管，仍由蔡润田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又选调校卫队队长周俊业、法律系63级学生蓝绍江、地质地理系保卫干事臧三江到保卫组工作。经总政批准，海军人员于1966年12月撤离北大。因高检院被砸烂不能报批，我不能撤离，白晨曦让我接任组长，从法律、哲学、中文等系选调九名学生、教员、干部，重建保卫组。1968年8月19日，“首都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校文革及其所属组室全部停止活动，独留保卫组继续工作，仍然让我任组长，接受宣传队指挥部领导，由军代表李志刚联系。经谢富治批准，1969年1月24日我离开北大回到高检院，随同高检院全体人员下放到湖北省沙洋农场办“五七干校”。

文革刚开始，北京卫戍区通知北大工作组：周总理指示，北大的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温特（美籍教授）为国家重点保护对象，要北大做好他们的保护工作。为此，二组（保卫组）采取了几项重要措施：一、给每人每户参照军队的做法结合北大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警卫档案，写明了他们的家庭住址，人口情况，四方邻居，从事职业；二、副组长陪同组长挨户走访，向对方说明他是周总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告知保卫组的住址、电话和联系人，问他们有什么要求和情况，随时向我们反映；三、编绘了每人每户的平面图，选定了巡逻路线和放哨地点等；四、安排了24小时轮流值班，电话记录和每人每户的具体保护人员。在工作组和校文革时期，六名重点保护对象和家庭没有发生任何安全问题。

“郑文”说：“工作组为什么能很快抓出6.18事件中打人的主要分子，是因为他们有一个专门的保卫部门，其中有专业的保卫干部如谢甲林，也有从法律系吸收的被工作组认

为政治可靠的学生。”“舒文”补充说：“二组从法律系抽了几个学生参加工作，有蓝绍江、苑世男等”。——事实是：6.18事件发生时，我还在高检院，6月22日到北大，6月底才到北大保卫组工作。另外，蓝绍江是1966年8月初选调到保卫组的，而苑世男则是1968年8月19日工宣队进校后，在我建议下从原“井冈山兵团”保卫组选调的三人之一。

“郑文”说：“1967年7月10日，‘红旗飘’和‘北京公社’等组织查抄了校文革保卫组二组驻地南阁和燕南园63号，抄出两批二组整的黑材料。”“舒文”补充道：“更加骇人听闻的是，他们还整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自点名保护的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同志大量的黑材料。”

众所周知，打、砸、抢、抄保卫组的后台是陈伯达。工作组保卫组和校文革保卫组从未驻过南阁，从未在南阁存放过任何材料或其他东西，也不知道任何组织或任何人存放过什么材料。1967年7月10日凌晨，陈伯达来北大，被反对校文革的群众组织“红旗飘”、“北京公社”等围住，牛辉林等借机诬告说：北大有个工作组留下来的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他们不作保卫工作，专整革命群众的黑材料。陈伯达随口说道：“那就叫他们停止工作。”陈伯达讲话后不到两小时，牛辉林等人便带领“红旗飘”等组织的群众到燕南园63号打、砸、抢、抄了校文革保卫组，扬言抄出两批由二组整的“黑材料”。他们对周培源说：“黑二组是个特务机构，不光整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还整了您的黑材料。”周培源说：“他们是特务机构，就应当砸烂。”接着，牛辉林等一些人在大饭厅举办“黑材料”展览，我亲自去看了这个“展览”。所谓抄出的由二组整的“黑材料”，其中之一，是工作组二组时期给六名（周培源、翦伯赞、冯友兰、饶毓泰、闻家驷、温特（美籍教授））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建立的警卫档案，其中第一卷是周培源的警卫档案。为此，我带领保卫组分管警卫工作的周俊业和分管办案工作的蓝绍江以及协助警卫、办案工作的校卫队干部肖祖德，亲自到周培源家，予以澄清。我们当面对他说，我们都参观了“黑材料”展览，牛辉林等人告诉您所谓“黑二组”整了您的“黑材料”，是工作组二组为您建立的警卫档案，当时二组组长蔡润田和副组长谢甲林亲自到您家访问过，已明确向您告知：您是周总

理确定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并把二组的住址、电话号码和联系人等写在一张纸上给您了。以后，又把对您的保护工作，在档案中作了记录。现在，您竟说“保卫组是个特务机构，应当彻底砸烂”这样的话，这是有失身份的，望您检讨、道歉。否则，我们就无法保护您了。

1967年8月17日，“红旗飘”、“北京公社”等五个反校文革的群众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周培源出席成立大会讲话，出任核心组组长，牛辉林等四人任副组长。从此，周培源离开家，住进28斋兵团总部，保卫组就无法对他实施保护了。8月24日，我被井冈山兵团绑架毒打致伤，保卫组停止了工作。后经校文革、北京市卫戍区、公安局请示，谢富治批准：“同意恢复工作，材料也应交回。”为了继续做好周总理指示的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保护工作，我把周培源上山担任井冈山兵团领导和已离开家入住28斋总部的情况，通过卫戍区上报给周总理。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周总理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身份出国。接着，北京卫戍区通知保卫组转告周培源，说：“李钟奇要给他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让我们把他送到卫戍区。”我亲自到28斋井冈山总部找周培源，被堵在门外，不让进去。我又到他家谈明情况，询问他在井冈山总部的电话号码，他妻子不愿告知，最后，我请他妻子给周培源打电话，要他给保卫组回电话，并告知了电话号码。第二天，通过电话告诉周培源说：“李钟奇要你到卫戍区给你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他没有拒绝，但是，担心交通、安全问题。我说：“请您放心，给您派专车，保证您往返安全。”周培源同意后，我对他又说：“明天上午9时，我和专车在28斋东门前30米处路上等您，您从28斋的窗户上看到时，我们俩人相互招手示意，我就到门口接您，把您送上班车，我会告诉司机蔡师傅，事关重大，往返务必保证安全，有什么情况，随时给我电话，我把电话号码给了他。”不到中午，周培源安全回到北大，又进入28斋井冈山总部，我们保卫组的任务就圆满完成了。

周培源从北京卫戍区返校后，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内部串连会，让周培源介绍李钟奇等传达周总理指示的情况。周培源从井冈山总部回家居住后，我曾亲自登门访问过，他对牛辉林、井冈山等打、砸、抢、抄保卫组，绑架并毒打我的行为，主动认错、赔礼道歉。我对他说，按照周总理关于国家级重点保护对象的指示，我们将继续而且进一步加强对他和家人的警卫工作，再次告诉其保卫组的电话，有关人员、财产和其他安全问题，随时联系，保卫组一定做到随叫随到，全心全意为他们的安全服务。他深受感动，一再赔礼道歉。

另一部分所谓“黑材料”，是保卫组配合北京卫戍区和北京市公安局侦破反革命案件搜集的笔迹资料。查对迹痕，属侦查破案范畴，是高等法学系、院校的一门重要的刑事技术学科，是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司法机关一项重要的刑事技术工作。它是破案工作的重要手段，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单就笔迹而言，通过笔迹筛查，把绝大多数或百分之百不沾边的笔迹人排除，对他们是有益的。例如，有一天在地学楼南墙外贴出一张署名“赤心”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攻击林彪，说林彪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赫鲁晓夫，但标题却是《毛主席的晚节保不住了》。当时，保卫组把它作为一类重大反革命案立即报告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立即派侦察员到北大来了，要保卫组协助破案。为此，保卫组向各系各单位收集、借阅了大量笔迹资料，其中确有“舒文”中说的“收集了一些学生的学习笔记本、日记本、入党、入团申请书和大字报底稿”，其目的是查对“赤心”大字报的笔迹。经过反复查对，排除了北大作案。最后，公安局从外校侦破了这起案子。事实证明：收集、查对笔迹，对破“赤心”一案，打击犯罪，保护人民是有益的手段。用收集、查对笔迹进行破案惩罚犯罪，保护好人，是世界各国的通例。郑实、舒声等人怎么到现在还要把它说成是“黑材料”呢？这是因为“无知”？还是别有用心？或者被人利用？就要请他们自己解释吧。

保卫组协助公安局在北大学生中侦破的最大反革命案件是“中国X小组”案。1968年1月上旬，北大学生杨绍明（杨尚昆之子）收到一封信，拆开一看，感到问题严重，便立即主动交给了保卫组。信的落款是“中国X小组”，附有《中国X小组宣言》。信的台头

是杨绍明，内容是动员他参加“中国X小组”和联络方式：回信用牛皮纸信封，地址是清华大学某某楼，约定的日期是某年、某月、某日。

保卫组马上把这封信和《中国X小组宣言》报告给北京市卫戍区和公安局，他们认为是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马上派侦察员到保卫组合作破案。我们一方面收集笔迹资料，查对笔迹，并按照“中国X小组”的联络方式寄去一封空白信；另一方面派保卫组的蓝绍江和公安局的侦察员一起“蹲坑”守候。其间北大学生傅某（彭真之子）也收到了同样的一封信，也交到了保卫组。

“蹲坑”到第三天，发现果然有人来了。来人把信拿走后便立即进了厕所，当他刚拆信时，被我们“蹲坑”的人员当场抓获。经审讯查明：写信人的真名叫谢世扬，是北大经济系的学生、井冈山兵团的成员。接着搜查了他的宿舍，查获了他的油印工具、《中国X小组宣言》底稿和尚未发出的《中国X小组宣言》等。经查对笔迹、指纹等痕迹，落实了全部案情，完全确认是谢世扬作案。

当天，在北大办公楼礼堂召开批斗会，谢世扬当场被公安局依法宣布逮捕，被警车拉走。因为保卫组不知道“井冈山兵团”的电话，无法将此事通知“井冈山兵团”，就用发表《声明》的方式，予以通知，希望“井冈山兵团”予以配合。次日，“井冈山兵团”发表声明：“谢世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予以开除。”

《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968年）1月17日 新北大公社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揪斗原红旗飘战斗队成员谢世扬，说谢是“现行反革命”，加以逮捕。

这条记载显然与事实不符。我希望在允许的情况下，请北京市公安局、现北大保卫部将《中国X小组宣言》全文公布于世，以正视听。

196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布了《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中发[67]19号）后，在一次会议上，周总理讲了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江青同志”，江青插话：“还要誓死保卫周总理”。

这些成了当时保卫组工作的信条。1968年3月，西语系保卫干部到保卫组报案说：有两个小青年在西语系图书馆从一本杂志上偷撕了一张有30年代江青同志与他人一起的剧照，是阶级敌人搞江青同志黑材料的反革命行为。对此，保卫组向中央文革、市公安局等单位写了《情况反映》。不久，市公安局派人到保卫组联合破案。经查，不是北大人的作案，保卫组就退出来了，由公安局自行侦办。据说公安局从人民大学附中破了此案，抓走两名作案学生。最后怎么处理就不知道了。

北大保卫组的全体成员，自始至终没有参加过群众组织，没有写过大字报，没有离开北大到市内和外地串连过一天，全心全意投入了北大的保卫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人事关系、工资关系等都在高检院，自始至终不是北大人的。

文革期间，我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1966年6月22日到1969年1月24日，先后在北大工作组保卫组和“校文革”初期任保卫组副组长、组长；1968年8月19日宣传队进校后任宣传队保卫组组长；1969年1月24日调离北大。二是从1969年1月24日到1972年7月在高检院和“五七”干校学习、劳动。三是从1972年8月调到北京市高、中级人民法院，主要是从事刑事审判工作。1980年1月调至北京市司法局工作。

我在30多年的司法工作中，养成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习惯。不论办案，还是回忆历史，都是遵循这一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事实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捏造、歪曲，它是不能改变的。认识是主观观点，是可以改变的。回忆历史，必须根据史实，才能避免谎言、欺骗读者，这是至关重要的。■

【评论】

事实与逻辑

——就北大武斗答宫香政同学

俞小平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内容为对宫香政同学的文章《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兼与俞小平、陈子明、林爻、艾群先生商榷》的论点和事实提出笔者的所掌握的事实和不同的结论，分为12条如下：

1. 北大大武斗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
2. 谁发动的3.29武斗？
3. 何法信为什么打宫香政？
4. 武斗中打死三名学生事件；
5. 关于公社头头在31楼发起武斗的预告；
6. 宫香政披露公社总部进攻31楼井冈山派的计划；
7. 公社派封锁井冈山楼群的证词；
8. 40楼的公社武斗队员是在井冈山的自卫中抓获的；
9. 郑培蒂老师与季羨林教授的遭遇；
10. 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迫害的井冈山成员；
11. 宫香政同学及其他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领导人应该厘清他们在北大武斗中应负的责任；
12. 宫香政为什么被定为“三种人”？

网刊《记忆》182期刊登了宫香政的文章《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兼与俞小平、陈

子明、林爻、艾群先生商榷》（以下简称宫香政文）。看到这标题，我不由得叹了口气：又被人点名了。我写了《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刊登在《记忆》上，本想到此为止，以后写点别的话题，却被人点名揪住不放，不得已只好一应再应。我要声明的是：我只对我文中所提出的事实在和论点负责，这里不包括我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的事实。本文也不涉及北大文革中形成两大派的政治动因，只谈武斗中发生的事件。请读者在读本篇文章时，参照我发表在《记忆》上的另外两篇文章：《做人的底线——我所经历的北大文革大武斗》（简称《做人的底线》，载于《记忆》152期）和《真相的迷雾——答章锋校友》（简称《真相的迷雾》，载于《记忆》172期）。为方便阅读，本文中引用的宫香政文，以仿宋体录入；引用的其他文献，以楷体录入。

1. 北大大武斗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

在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方面，已发表的大多数回忆录为自己一派辩护，众口一词地认定是从1968年3月25日地派大学各组织进入北大反对新北大公社、支持井冈山兵团开始的（见王复兴：《抢救记忆》，美国南方出版社，2016年9月）。而井冈山兵团方面则认为是3月29日凌晨1时，由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预谋装备训练策划，重兵攻打、抓捕、驱赶31楼井冈山派同学开始的。

这里必须厘清的是：什么是大武斗？

北大校友艾群在《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中提出了大武斗的定义：

“须知，此前聂元梓所称北大武斗，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武斗。其时所称武斗有着两个不同的含义：文革初期所说武斗，指的是对批斗对象实施拳打脚踢等暴力手段，相应的口号是‘要文斗不要武斗’；包括两派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充其量只能算作打架斗殴。真正

的武斗，准确说应该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成规模有组织的武装冲突，相应的口号是‘文攻武卫’。”

宫香政文中说：

“3月25日有XX学院东方红、XX学院延安公社、XX学院造反团、XX大学东方红等组织大约二千多人相继来到北大……”

3月26日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南、西闯进北大，发生武斗……”

看来宫香政同学不认可同为新北大公社的王复兴等人所说的“3.25地派万人闯进北大”的说法，那么二千人、或者几百人闯进北大的后果呢？那么是谁被打伤了呢？能不能真名实性地提出几个伤者的例子？我在《真相的迷雾——答章铎校友》中就提出来了，迄今为止没有人回答我的问题。而我在我的回忆录里对新北大公社派在北大武斗中打死、打伤人的事例都是有名有姓的。

如果说，一派的武斗队以武力完全占有座楼房、赶出另一派人员就是挑起大武斗者的话，那么新北大公社就是这样的组织。王复兴在《抢救记忆》中说：

“到3月25日晚9时，北大回归风平浪静，一场大规模武斗被制止。25日下午，北大没有发生大型武斗冲突，没有发生攻楼事件，没有发生人员伤亡。因此人们可以批评“井冈山”企图借用外力挑起大规模武斗。但只是企图而已，并没有真正发生。校文革、“公社”总部该收手时不收手，反而要出手。25号深夜和26号，孙蓬一控制的“公社”武斗队主动出击，攻打井冈山，真正挑起了武斗升级。25号深夜，王G.带领“钢一连”攻打“井冈山”广播站。此事被本派的马云龙看见，他无法制止。三天之后马云龙在北大三角地贴出大字报，声明反对校文革、公社总部挑起武斗，声明辞去“公社”驻“首都红代会”代表身份，声明退出“新北大公社”，以示抗议。马云龙对我讲，“‘钢一连’胡来，孙蓬

一昏了头。武斗会死人的，他才不会替校文革背黑锅呢。”3月26日，“钢一连”在王G.的带领下，占领了29楼，把楼里“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都赶走了。我、索世暉、陈双基、任瑚璉听到消息都不约而同赶到“公社作战部”。此时“作战部”已成为“不作战部”、“拒绝武斗部”。索世暉一见我面就大骂孙蓬一，说他扩大武斗，是“胡闹”、“混蛋”。大家交流了消息，交换了看法，认为孙蓬一挑起武斗升级是绝对错误。但很无奈，“作战部”决定不参加武斗，反对两派扩大、升级武斗。”

从王复兴文中可以看出，聂元梓在3月25日施压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谢富治下令轰走了进入北大的地派院校人员，却无视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25日晚决策发动武斗强占29楼。王复兴和他在新北大公社“作战部”的伙伴们，出于同学情谊反对孙蓬一等挑起大武斗，无疑是良心之作，我在此向你们表示敬意，感谢你们没有参与对井冈山派的武力围剿。文革中派别哪里都有，不是非要在战场上拼个你死我活的。王复兴的这段文章指出：以孙蓬一为首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极端派控制了公社武斗队，在3月26日攻占29楼时开始，挑起了北大武斗。

根据王学珍等编写的《北京大学记事》所载：

“3月20日，校文革决定成立‘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高云鹏为总指挥，宫香政、黄元庄为副总指挥，卢平为政委。

4月26日，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下，又组成了以黄树田为总指挥的‘东线指挥部’和以宫香政为总指挥的‘西线指挥部’。”

宫香政同学，作为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的副总指挥和西线指挥部的总指挥，你对北大武斗的策划和实施有着不可掩盖的责任。

2. 谁发动的3.29武斗？

我们北大老五届，由于文革的干扰，没有读完该读的课程，就被赶出北大之门。但是我们好歹都是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又在北大受过几年学术熏陶，说话、做事、研究学问，都得讲究两件事：一是事实，二是逻辑。以事实为基础，加以合乎逻辑的推导，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这是我一生都不敢忘却的。没有事实就妄加推论，肯定不能揭示出真相。

虽然在本文的前面，我已经论证了，北大武斗是在3月26日由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攻占29楼挑起的，但是在其后的两天内，井冈山兵团总部并没有以牙还牙，攻占任何一座宿舍楼。公社武斗队攻占29楼也没有造成北大学生的大批逃亡。如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到此为止，大武斗仍然会就此止步。但是新北大公社的王复兴等反对挑起武斗的温和派已经发现，孙蓬一等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极端派领导人挑起武斗的决心已经不会改变，挑起武斗的势头已经无法阻挡，他们决心以武力打垮井冈山，独霸北大的天下。公社武斗队攻占29楼没有引起井冈山总部的足够重视，井冈山的总部委员们还被蒙在鼓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预谋对井冈山的沉重一击正在逼近。我们还是看看3.28~29之夜发生了什么吧。

我在《做人的底线》中说：“不仅31楼，40楼也打起来了，幸亏10纵的老井预作准备，在其他纵队的支援下，竟然打败了准备不足的红10团（新北大公社的系级组织为‘战斗团’，西语系的新北大公社组织称为‘红10团’），俘获大约30名新北大公社成员，连红10团团长都被俘，‘战俘’被押送到28楼，关押在二楼的一个房间里。”本文在《记忆》发表后，引来一些原新北大公社极端派成员的齐声欢呼，说我承认井冈山率先发动武斗了。我把我的这一段文章读了几十遍，又请教了若干同学，也没有读出宫香政同学等人为我的文章解释的新意。

宫香政文中说：

“从时间上来看，40楼里公社成员被驱赶在先，31楼争夺战是在其后。”

宫香政同学这样的说法违反事实。我是3.28~29之夜一直在28楼井冈山总部值勤的当事人，当3月29日凌晨1时，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开始在31楼进攻井冈山同学时，40楼还毫无动静呢。宫香政等公社武斗头头为了集中兵力攻打31楼，不对40楼的公社派救援。你不以专业武斗队，比如钢一连、革命工人兵团等前往救援，难道不能动员普通新北大公社成员吗？公社派的整夜不停的广播喇叭当时不是也在大喊大叫为新北大公社的行动撑腰吗？为什么不像井冈山用广播喇叭呼吁增援28楼一样，呼吁新北大公社成员向40楼增援呢？当夜井冈山兵团尚无任何一支专业武斗队，我们在28楼的老井们照样每人手持一根1米长的钢筋向31楼推进，结果不难想见，面对手持长矛的公社专业武斗队的强势冲锋，我们毫无悬念地狼狈而逃，退回28楼。31楼的井冈山派同学在凌晨1~2时被赶出31楼，逃到28楼井冈山总部求救。而当40楼公社被井冈山俘获的“战俘”押送到28楼时，天已经快亮了，这是我在现场亲见。31楼武斗被新北大公社攻占，早于40楼武斗，是再明确不过的。

我在此声明，我从来不认为井冈山兵团率先发动大武斗，我所发表的所有关于北大武斗的回忆录里都没有这样的表意。

宫香政文中引用“散淡天涯”的《北大3.29武斗印象》（载于《燕园风云录（一）》）说：

“1968年3月28日，武斗前夕，大约傍晚时分，井冈山五一纵队在40斋召开会议，主持者通报了一些两派斗争的情况，说已经发生了井冈山兵团人员被抓走的事件，告诫大家以后不要到未名湖散步了。尤其强调说“新北大公社那边准备了铁棒、长矛等武斗工具，分发了白毛巾准备绑在胳膊上作标志”，看来一场死战已经在所难免。要求我们当晚就将自己宿舍里的公社派同学赶出去。组织了一些男生寻找铁棍制作武斗工具，还派人去摘掉公社派的高音喇叭。”

从上面的引文可见，新北大公社准备在先，井冈山寻找武斗工具在后。事实证明了井

冈山确实有人被公社派抓走，樊立勤就是3月27日在未名湖边被公社武斗队抓走、押到43楼酷刑逼供的。在宫香政同学所引“散淡天涯”的《北大3.29武斗印象》的段落下面，接着的是以下段落：

“我和小X都觉得不可能发生你死我活那样的武斗，因为观点再对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敌人’，毕竟都是朝夕相处的同窗啊！不要说武斗了，就是赶走他们也是万万不可的。这叫我们十分为难。不料我和小X回到35楼宿舍时，公社派的女生已经离开了。由此可知新北大公社那边也做了相关部署。我和小X面面相觑：‘难道——真的要打？’我们开始担心了，而后来发生的一切，也证明了我们的担心并非多余。就在当天夜里，亦即3月29日凌晨，武斗发生了。

当时我和X已进入梦乡，突然被一阵突发的嘈杂声惊醒了。我们不敢开灯，悄悄地透过玻璃窗向外张望。只见井冈山男生住的30斋（笔者注：应为31斋）那边灯光乱闪人声鼎沸，有男生变了嗓音地嘶喊：‘公社派的攻楼了！’接着我们就看到有些井冈山的男生只穿着汗衫裤衩从二楼和三楼的窗口跳下来，有的刚刚落地就被胳膊上绑白毛巾的人用铁棍狠狠地戳打。小X焦急地说：‘这样跳下来，又被这样子暴打，人还能有救吗？’我当时除了惊恐愤怒，剩下的就是透骨的无奈，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

天亮之后，校园里议论纷纷。听我们班井冈山的男生说，当天夜里他们住的40斋也同时被新北大公社的人突袭了，包围之后一部分人还冲进了楼里。井冈山的同学就组织起来往外冲，有的也从二楼三楼窗口往下跳。不少人冲出来时被对立派从楼上扔下的砖块砸破了脑袋，有的被对方用铁棍、长矛打伤。”

宫香政同学，上面的引文中说的“当天夜里他们住在40斋的男生也被新北大公社的人突袭了。”这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引用呢？

以上所引用的“散淡天涯”的段落能证明井冈山首先发动武斗吗？我认为不能。

宫香政文中多处引用原哲学系学生陈焕仁著《红卫兵日记》（香港中文大学2006版），顺便指出，陈焕仁与宫香政同学同属新北大公社成员。我请宫同学阅读该书的两段话：

“3月29日 星期五 晴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双方都在紧张备战。公社利用掌控在手里的实验工厂和实验室，将上等钢板制成盔甲，将钢棒（笔者注：应为钢管）加工成长矛，从仓库里取出军训穿的军棉袄，将全体公社战士武装起来，公社战士头戴柳条帽，身穿护身盔甲，身着军棉袄，一个个像古代武士，构筑起坚固的工事将井冈山占据的楼层跟公社的防区完全隔开。”

“31楼硝烟未散，40楼的争夺战跟着打响，从31楼和32楼赶出去的井冈山，他们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向40楼发动了猛攻，40楼的公社红9团战士且战且退，最后被迫纷纷跳楼，40多人被抓住当作俘虏。”

陈焕仁的日记里的以上引文清楚地说明，40楼武斗发生在31楼武斗之后。

以上宫香政同学引用的散淡天涯和陈焕仁的两段文章，都不能证明井冈山率先发动大武斗。

最近一段时间，从北大校友微信群得知，1968年3月29日凌晨在40楼指挥武斗的新北大公社头头是东语系红9团团长郑雄。我希望郑雄站出来，以当事人的身份对40楼的3.29武斗事件据实作证。

宫香政文中说：“现在井冈山校友写出的许多文章，大多只谈公社夺占31楼，而回避了井冈山在40楼首先挑起武斗的事实。”

但是新北大公社重要干部王复兴在《抢救记忆》中说：

“25号深夜，王G.带领“钢一连”攻打“井冈山广播站。”

“3月26日，“钢一连”在王G.的带领下，占领了29楼，把楼里“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都赶走了。”

“3月29日，‘公社’武斗队占领了化学系宿舍31楼，把“井冈山”一派的学生驱赶出31楼。”

王复兴在他的回忆录里谈及公社的王G.带领钢一连攻打28楼井冈山广播站、攻占29楼、攻占31楼的武斗，而对40楼的武斗未提一字。如果40楼武斗是井冈山发动的，王复兴怎么会只字不提呢？顺便提一句：王复兴文中的王G.就是钢一连连长王刚。

宫香政文中说：“公社的行动打乱了井冈山原有的计划，40楼与28楼相距甚远，仅靠占领40楼也无法控制西南校门，所以井冈山就放弃了40楼。”

宫香政同学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井冈山有什么“原有的计划”。宫香政不会不知道，40楼虽然离28楼很远，但是它就在37楼的西边。在海淀路边，围墙里的北大学生楼41、40、37、34楼从西向东一字排开。如果井冈山不放弃40楼，公社派只能占领它西边的41楼作为武斗据点，井冈山与公社就会隔着西南校门对峙，40楼与东边的37楼就都会在井冈山手里，井冈山被紧紧包围的劣势就会大大改善，40楼就不会成为新北大公社西线武斗总指挥宫香政的西线武斗指挥部和公社派骨干武斗队“钢一连”的驻地，西南校门就不会成为公社派围堵、袭击、抓捕井冈山人的重要出击地。

宫香政文中说：“3.28-3.29武斗后，公社一方并没有包围井冈山的意图。当时，双方可以自由去食堂就餐、去校医院就医，在一些楼里双方同时居住。如41楼就是两派同住的。”

“去校医院就医”？化学系64级井冈山的严文凯向我作证：“3.29凌晨他与一些井冈山

同学送伤员去校医院，宫香政站在校医院门口堵截，不许井冈山的伤员进入校医院接受救治。”

井冈山同学不能到仅距31楼200米远的校医院接受救治，不得不前往7公里以外的北医三院，在夜间没有公共汽车的情况下，井冈山只能依靠仅有的一辆卡车运送伤员，其效率之低可知，濒死的樊立勤是靠大发善心的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的专用吉普车才逃得一命的。

“双方可以去食堂就餐”？3.29武斗后，每天都有去食堂的、在校园路过的、在海淀街上购物的井冈山同学被公社武斗队抓、打、关押。被新北大公社的审讯员在43楼几近打死的樊立勤在北医三院昏迷不醒；我班的郭青苔就躺在樊立勤病房的隔壁，为自己被公社武斗队在44楼刑讯室里打断的腿痛苦呻吟；我在海淀街上被你们的武斗队抓去打得不能走路；我班女生周振琦被你们武斗队抓去打得神志不清。在四个月的大武斗期间，有几百名干部、教师、职工、学生被公社武斗队抓捕，其中有数十人被长期关押。宫香政同学，你是新北大公社武斗副总指挥兼西线武斗总指挥，理应熟知这些与你的职责相关的事件。

3. 何法信为什么打宫香政？

宫香政文中说：“3月29日夜，趁我上厕所不备之际，原井冈山未上任的组织部长何发信同学还打了我一巴掌，双方吵了起来。我有条件把他抓起来，但是，我没那样做，毕竟是多年的朋友，所以就不了了之。”

为此我向何法信同学询问此事的前因后果，何法信同学以电邮告诉我：

“关于打宫香政一事，我已经不记得是哪一天了，但是肯定在3月29日以前的一段时间。那天晚上41楼的五楼有武斗，出于好奇，我去看了一眼。结果遭到宫一帮人的打骂，我清楚地听到，宫香政骂我是‘狗崽子’。回到宿舍后越想越火，便趁他上厕所的时候打了

他一耳光。他在仓促逃跑时又撞到了墙上。如果他不骂我，我是不会打他的。

宫香政逃回宿舍之后，便叫来一帮一、二年级公社派的人到我的宿舍门前叫骂，但考虑到我们班井冈山的同学不好惹，故未敢动手。

至于当组织部长一事，还确有其事。老井创办之初，刘立民曾叫我当我们系的组织部长，但我当时并没有答应，以后也没有为老井做任何事情。这件事恐怕连我们班的大部分同学都不知道，但宫却了如指掌，可见人家的情报工作做得不错。

后来我也反复想这件事，他完全有能力组织人把我抓起来，打一顿，甚至打个半死。但他没有这样做，现在想来他人性并没有完全泯灭。在这一点上我是应该感谢他呢？”

宫香政同学自以为根正苗红，拿当时被北大人普遍反对的“血统论”压人，无端辱骂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为“狗崽子”，任何一个有血性的男儿都不能忍受这样的人格侮辱，因此何打了宫香政一个耳光。宫香政同学，你在文中提出这样一个事件，难道你现在还认为你可以任意辱骂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吗？

至于何法信同学的未上任的组织部长一事，经证实是井冈山兵团技术物理系的17纵纵队长刘立民要何当井冈山技术物理系的组织部长，不是井冈山兵团总部的组织部长，何未答应就任这个组织部长，宫同学为什么要拿一件从未发生过的事情来说事呢？

4. 武斗中打死三名学生事件

宫香政文中说：

“武斗期间，公社一方个别人失去理智，打死了校内外的三位青年学生，这种事情无疑是极其错误的，面对这些不幸事件，公社总部全体负责人都心痛不已。这种事件对我们

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只能责怪自己没有能力控制好所有人的思绪，但并不存在事先策划、指使、授意的问题。”

新北大公社打死校内外的三名学生，宫香政同学认为“极其错误，心痛不已”，我认为这是一个进步，宫同学没有像某些原公社派的回忆录，为这些罪行辩解为：“抓偷书的小偷，打重了点（对温家驹）”；“4.26武斗吃了亏，产生报复情绪（对殷文杰）”；“很多人乱打打死了（对刘玮）。”但是这样的杀人暴行一再在新北大公社重演，说明公社内部极端派在武斗期间从未把杀人当作大事，没有对杀人罪行严令禁止。一个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在公社武斗队员在44楼公社总部外刺杀路过的井冈山成员殷文杰后，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竟然没有把杀人凶手送到海淀公安局去接受调查。当时作为北大“准派出所”的“校保卫组”及其负责人谢甲林，对于这些杀人案件，完全视而不见。宫同学，这杀人案的责任岂是仅仅“并不存在事先策划、指使、授意的问题”就能逃脱的？清华大学近年来的文革研究，已经把武斗中18名死者的发生现场详细情况和责任一一厘清，而北大文革武斗死亡只有3人，而且都是发生在公社占据的地盘，责任人都是公社派的武斗队员，这里有什么困难，竟然经历近50年都查不清楚？

5. 关于公社头头在31楼发起武斗的预告

宫香政文中说：

“俞文”引用了笔名为“田老兄”的一段文章说：“3月28日下午……许多同学感到大难即将来临”，又说“晚8点，公社头头XXX挨室告诉‘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大家要有准备’……‘其实他心中大概早已有数’”。

“田老兄”自称住在31楼，31楼是两派混合共住，公社头头怎么会去“挨室告诉”“井冈山要挑起大规模武斗”？公社的头头是谁？是哪一级的头头，公社总部头头里没有化学系

的人，外系的头头不熟悉31楼的情况，如何去“挨室告诉”？走错了门，不被井冈山抓走了吗？显然逻辑上是不通的。“3.28”武斗由井冈山驱赶40楼公社同学引起，公社总部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谁也做不到心中有数，“挨室告诉”的事也不会发生。田老兄的话纯属臆造。

“田老兄”是化学系62级学生田建行的笔名，他是新北大公社成员，新北大公社“第二期学习班”成员。宫香政同学的这一段辩论，未免有强词夺理之嫌。化学系男生住在31楼人所共知。田建行因为没有事先征得该公社头头的同意，在回忆录里未暴其名，是对该公社头头的尊重。此处说的“公社头头”，不等于非得是公社总部委员级的头头，公社红3团团长许华堂不就是头头吗？许华堂不是参加了3月28日新北大公社总部策划当夜武斗的“战斗团团长紧急会议”吗？宫同学说化学系公社派因为没有总部委员，就不能传达总部的命令，这样的推论合乎逻辑吗？许华堂是化学系62级学生，住在31楼，不存在走错门这样的推论。“两派混住”，不等于每个寝室都是两派混住。我所住的41楼，我班38个男生住7间宿舍，其中的3个宿舍全部是井冈山派的同学住的，没有公社派的同学在内。再说“两派混住”的宿舍，可以把公社派的同学叫出来告知。见了井冈山派的同学，你不开口说这事，井冈山人怎么知道这位头头是来通知武斗的？所以“田老兄”的话在逻辑上没有问题，田建行没有臆造。

6. 宫香政披露公社总部进攻31楼井冈山派的计划

宫香政文中说：

“3.28~3.29武斗的详细过程是：3月28日晚饭后，公社总部接到报告：井冈山兵团在40楼动用武斗工具驱赶公社的同学。于是，公社头头在总部办公室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会议中，大家分析形势，认为：28楼已被井冈山占据，31楼里井冈山的人员较多，他们又从校外运进了一些木棒、铁棍等武斗工具。如今，他们又要占据40楼，是想控制西南校门，

开通与校外“地派”联系的自由通道。而28楼和31楼是学生宿舍核心区，井冈山一旦占据了28楼、31楼和40楼，那么，公社一派在宿舍区将无立足之地，局面是非常危险的。面对这种危险局面，我们不能被井冈山牵着鼻子走，为了打乱井冈山的计划，我们不与他们去争夺40楼，我们必须占据31楼，才能稳住阵脚。尔后，立即召开了战斗团长紧急会议，分析了形势，讲了对策。当时，化学系的红三团团长觉得非常为难，最后，经过大家激烈讨论，红三团团长勉强服从了大家的意见。为了不让化学系的公社同学为难，分配他们在楼外防守井冈山的进攻。当时，公社一方准备了部分长矛、护心甲和柳条帽，但没有配发像井冈山个别校友所说的黄色军棉袄，白毛巾是临时发的，不够则用白布条代替。当晚11时过后，公社开始夺占31楼的行动，这就是3.28-3.29北大武斗中公社一方全部过程。”

宫香政文中透露了很多信息，其中有些是人们过去所不知道的，有些是不符合事实的。

首先，到现在为止，没有证据证明，井冈山有这样一个宫同学所说的占领28楼、31楼、40楼计划，这样的计划只存在于公社派头头的想像之中。28楼不是在3.29之前就被井冈山完全占领的，井冈山是在3月29日凌晨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夺占31楼、把化学系井冈山同学全部赶出31楼以后，为了总部的安全，才由海燕战斗队（井冈山的青年工人组织）在3月29日下午挨门清理非井冈山人员的。

其次，从宫香政同学所披露的“新北大公社战斗团紧急会议”过程可知，在井冈山采取行动占领任何一座宿舍楼之前，新北大公社战斗团紧急会议已经决定先下手为强，率先攻占31楼，把楼内的井冈山人完全赶出去，如果敢于反抗则武力解决。3月28日白天在40楼两派发生的冲突，仍然是3月份一系列冲突的一部分，如果公社派在3月26日攻占29楼后，不在3月29日向31楼发动进攻，双方仍然不会走到无法回头的大武斗这一步。

了解当年北大的人都知道，从南校门和西南校门进入的北大宿舍区，宿舍楼号从16至44，共有28座楼之多（缺33号楼）。宫香政同学说：“井冈山一旦占据了28楼、31楼和40

楼，那么，公社一派在宿舍区将无立足之地。”这就是公社派发动武斗的借口吗？那么当井冈山在4月26日以后稳定占据了28、30、32、35、36、37六座楼后，比宫同学所言的楼数多一倍，井冈山楼群怎么反而被公社派的武斗楼团团包围，生存困难呢？宫香政同学，这样的推测不符合后来发生的事。

7. 公社派封锁井冈山楼群的证词

宫香政文中说：“‘俞文’引用了艾群在《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中的如下资料……”

艾群文中的“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讯问笔录”的可靠性问题应由艾群回答。艾群校友说，这份讯问笔录是他通过司法部门正规手续查阅所得。

至于艾群在文中所说“公社一方给井冈山断水、断电、断粮、断炊”，这不仅是艾群文中所说，也是我在井冈山楼群里四个月的亲身体会。“四断”并不是说公社派把井冈山的水电粮炊从头到尾完全彻底地切断，而是时通时断。井冈山楼群里的炊事主要靠电炉，断电的时候也就是断炊的时候，断水也是断断续续的，断粮指的是去海淀镇买粮买菜的同学被公社武斗队殴打，一旦有人被打，就只能等待一段时间，等到公社派的封锁放松了才能再出去采购。这些都是本人亲身经历的。

如果宫香政同学怀疑我的证词，可以看看新北大公社方面的证词，下面我引用陈焕仁《红卫兵日记》几段相关的记录：

“5月16日 星期四 晴

我们边谈边提高百倍警惕，虽然井冈山已经被装在公社口袋里，他们在断水断电切断补给线的情况下，居然在所占楼间挖通了地道，在几座楼间架起天桥。

我和黄永红劝公社战士不能虐待俘虏，公开不赞成对井冈山断水断电，切断井冈山的粮食供应。

6月10日星期一 晴

公社终于发现，几个井冈山死硬分子扛着粮袋，越过大马路拼命跑向地道入口，封堵的公社战士手持长矛从两边合围，石块像雨点似的打去，背粮的井冈山分子虽然受了重伤，还是扛着粮袋钻进了地道。”

据陈焕仁校友日记中所记，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楼群实施了“断水断电切断补给”。

8. 40楼的公社武斗队员是在井冈山的自卫中抓获的

宫香政文中说：“俞文中说：‘公社武斗队员被井冈山俘获，是在井冈山的自卫中发生的’，这和他在《记忆》第152期中所说的自相矛盾（上文已引，此处不赘），毫无准备的‘自卫’能抓30多名公社的同学吗？”

本文在前面已经解释，“公社武斗队员被井冈山俘获，是在井冈山的自卫中发生的”这句话并无错误。公社武斗队员被俘，只能怪公社过于注重拿下31楼，没有把40楼的井冈山当回事。宫同学如果要想得到可靠的结论，必须先有可靠的事实和正确的推论，而不是靠猜测。“毫无准备的‘自卫’能抓30多名公社的同学吗”这样的问题，宫同学还是去问问当年的红九团团长郑雄吧。

9. 郑培蒂老师与季羡林教授的遭遇

宫香政文中说：

“我没有看过郑培蒂老师的回忆录，但从俞小平引用的部分文字中，我没有发现郑老

师是被聂元梓授意批斗的，也没发现是聂元梓把她关进牛棚的。从文中可以看出郑老师是一位活跃人物，是井冈山骨干成员，她声称“他们必须打倒我来削弱井冈山的势力”，她一个人居然关系到整个井冈山的势力，俨然是以井冈山要员自居了。但当郑老师被揪斗时，你们井冈山的人干什么去了？季羡林先生也被公社揪斗过，他还是你们的纵队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没有挺身而出予以保护呢？这两位要员都在牛棚里，你们为什么没有去解救他们呢？因为，你们自己也认为他们有问题，所以，连一纸保护他们的声明都没有发表，就把他们抛弃了，甚至也进行揪斗。”

这里有两个被校文革下令关押在诨名“牛棚”的校文革劳改大院的不幸的井冈山成员：郑培蒂老师与季羡林教授。

先说郑培蒂。我从来没有说过，郑培蒂被关押是聂元梓本人授意。但是我坚持，“他们都是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某些成员所犯的非法暴行的受害者”。无论抓捕、关押郑培蒂是否聂元梓亲自授意，郑老师都是聂元梓领导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抓捕、关押的。设若没有身为北大校文革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首都红代会主任的聂元梓在新北大公社后面撑腰，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怎么能开设“牛棚”、拘捕关押数百名北大干部和教师？

宫香政同学在文中很奇怪地问道：“但当郑老师被揪斗时，你们井冈山的人干什么去了？”我很惭愧，难以回答。因为我们井冈山人大多数已经逃出北大，各谋生路去了；少数住在原住楼里，在公社派的逼迫下屈辱地写“造反下山声明”，即退出井冈山的声明；更少数的井冈山人则被你，西线武斗总指挥宫香政和东线武斗总指挥黄树田指挥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围困在井冈山楼群的六座宿舍楼里，整日里心惊肉跳，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宫香政同学，没有你和其他公社派武斗队领导人的努力工作，我们井冈山人不会惨到这种地步。四十九年之后，你还要以此来羞辱我们井冈山人吗？

郑培蒂的回忆录《云卷云舒》里提到两个与我相关的老师：郑培蒂和邓懿。郑培蒂是我在北大读一年级时的英语课老师，现居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邓懿是我读二年级时的英语课老师，已于2000年在北京去世。他们都是给我深刻印象的老师。在她们的一生中，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兢兢业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来没有过任何违法行为或犯过任何错误。她们不应该受到非法抓捕、关押、侮辱、折磨等等的虐待，任何为这样的罪行辩护的行为，无疑都是良知的泯灭。

再说季羨林。季羨林被校文革关进“牛棚”，加诸其身的罪名不是井冈山所敢于对抗的，井冈山出于自保没有保护季羨林，乃至对他进行调查，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季羨林在《牛棚杂忆》里对井冈山和某些个人的批评说得很对，井冈山应该为当时对待季羨林的态度向他道歉。

我希望宫香政同学不要仅仅在此奚落井冈山对季羨林的不义，还是读读《牛棚杂忆》里对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在“牛棚”里对季羨林和其他教师的无休止的折磨和批斗的描述吧。井冈山没有保护他，但是井冈山也没有迫害他。“牛棚”是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没有“牛棚”。《牛棚杂忆》在网上很容易找到，关心季羨林教授与井冈山这段恩恩怨怨的读者可以自行上网查阅，季羨林在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牛棚”里的痛苦经历同样可以查到。

10. 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迫害的井冈山成员

宫香政文中说：

“俞小平先生在文中引用了一些北大师生受到迫害的控诉文章，其目的是控诉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罪行’。这些受到迫害的干部、师生，他们的身心受到了严重伤害，是值得同情的。但这证明不了井冈山是正确的。”

宫香政同学说：“但这证明不了井冈山是正确的。”请宫香政同学说清楚，在北大师生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迫害这个问题上，井冈山做错了什么？是没有攻打“牛棚”救出受害的干部教师吗？是没有攻打公社派的黑牢房、解救被公社派抓捕、关押、酷刑逼供的樊立勤等井冈山成员吗？是没有冲击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举办的批斗所谓“井冈山坏头头徐运朴等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大会吗？

关于被逮捕、被关押的井冈山人，新北大公社成员陈焕仁的《红卫兵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

6月16日 星期日 晴

“我拿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翻看，林红神秘地对我说，红五团抓到井冈山的一个坏头头，很像是我们班的曹卫东，红5团要我们派人去识别下，林红决定叫我赶紧去。

我真不想去干这等事，最近公社公布了首批井冈山战犯名单，命令公社战士随时随地予以捉拿，其中就有曹卫东。自开战以来，公社一直在四处抓捕井冈山的坏头头，为了避免报复，一般都采取交叉抓捕法，即这个系的坏头头由所在地系侦察到后，再由外系公社战士去抓捕，避免同班同年级同学互相抓捕，加重对立与仇恨……”

接下来的文中，陈焕仁去了曹卫东关押现场，见到了曹卫东，没有指认他。

由此可见，陈焕仁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下面再录一段陈焕仁的日记：

“6月24日 星期一 晴

早晨，公社派人去长春，捉拿逃到长春去的井冈山坏头头，林红把护送任务交给我，派石红兵和我护送他们到北京站.....

我们说到这里，远远望见出站口突然围了不少人，我们赶紧走近细看，新北大公社红3团，一直在火车站守候从外地潜回北京的井冈山的一个坏头头，今天终于在出站口将那个坏头头逮住，用他的衣服蒙着他的脑袋，就要将那个坏头头押回校，生怕他们叫我们帮忙，我们赶紧躲开了。”

从陈焕仁的行为可知，当时就不是所有的新北大公社成员都认为井冈山的头头是坏头头、是战犯、就有权抓捕、关押、殴打、逼供的。

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对井冈山兵团的四个月的围剿，造成很多井冈山人的身心伤害，对某些人的伤害延续至今。

最近加入一个北大人的微信群，樊立勤也在其中。他在1968年3月27日至29日期间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抓捕后施以酷刑，右臂、右腿被打断，左膝盖被大铁钉钉碎而终身强直、手指甲被钉竹签、全身被烟头烧焦七十余处，落下残疾。因为手指残疾不便打字，樊立勤与群友交流的方式主要是语音，数十年来身体状况一直不好，即便讲话也不能超过10分钟。

井冈山兵团技术物理系65级的俎栋林向我作证：

“1968年6月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钢一连”在井冈山总部委员牛泰生在济南的家里非法抓捕了牛泰生，押回北大监押刑讯逼供，然后以牛泰生名义给井冈山总部打假电报说要返校，定于6月底某日在丰台下车，要求总部去车站接站保护。井冈山总部派了包括俎栋林在内的5个人前往接站，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钢一连”30多人包围，只有带队的技术物理系61级的肖正贵逃脱，其他4人落网。俎栋林认出了现场指挥的“钢一连”副连长、

技术物理系63级的马彤军。4名被俘人员中，俎栋林被关押三天三夜，提审10次，不开口就用铁管残酷殴打臀部和双腿。幸而俎栋林“出身好”才得以释放，经检查腰部以下及两腿全部皮下出血呈青紫色。年轻时没有当回事，近年来发现腰臀部脊椎严重损伤，每天为疼痛折磨，近于瘫痪。”

下面我要重点介绍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徐运朴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迫害的惨状。

1968年7月17日，校文革的机关报《新北大》第四版上，刊登了以下一篇奇文：《井冈山兵团坏头头、现行反革命分子、徐运朴的认罪书》，全文如下：

“我是一个恶毒攻击，疯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我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攻击我们的林副主席，攻击中央文革，特别是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我们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语言是相当恶毒的，我是罪该万死。我请求毛主席和人民宽恕我，给我一条生路，给我重新作人的机会。

我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向敬爱的周总理请罪！向敬爱的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首长请罪！向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请罪！向新北大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请罪！向保守组织新北大井冈山中的广大受蒙蔽的战士请罪！

我是北大井冈山中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我和牛辉林等一伙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起疯狂炮打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起订下反革命攻守同盟。现在我决定同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决裂，彻底揭发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全部罪行，用实际行动向党和人民靠拢，以求得毛主席和人民的宽恕，给我重新作人的机会。

我们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之所以现在才被揪出就是因为有北大井冈山这个保守组织作掩护，我们躲在幕后，操纵北大井冈山这个保守组织干尽了坏事。我们勾结王关戚林，引导北大老保组织井冈山走上反对中央文革的道路。例如我们煽动抓军内一小撮；把67年7、8月份形势讲得漆黑一团，说全国处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前夜；顽固对抗毛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顽固对抗中央文革和北京市革委会关于北大井冈山接受新北大校文革领导的指示；后来又为孔杨翻案；为老井红翻案；欺骗井冈山广大战士，胡说红旗飘里没有坏人；煽动挑起武斗等等，这些都是为了煽动和引导井冈山走向反对江青同志，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道路。这几天，经过新北大公社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和耐心地教育，我初步认识和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我决心不再同毛主席和广大革命群众顽抗下去了，不再与人民为敌了。我要彻底交代自己的罪行，彻底揭发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我要彻底坦白，重新做人，不再沿着反革命的罪恶道路走下去了。我也希望井冈山中广大战士不要再受我们蒙蔽了。你们应该赶快清醒过来，同我们这个现行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

我的罪恶是滔天的，我再一次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向我们的林副主席低头认罪！向敬爱的周总理低头认罪！向敬爱的伯达、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首长低头认罪！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低头认罪！向新北大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低头认罪！向保守组织北大井冈山中受蒙蔽的广大战士低头认罪！我愿意接受新北大全校革命师生员工、接受新北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新北大井冈山兵团中广大战士的批判斗争，通过批判斗争把我挽救过来，改造成为新人。

我保证用实际行动彻底交代自己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彻底揭发以牛辉林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的滔天罪行，希望毛主席和广大人民，新北大公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宽恕我，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

徐运朴

1968. 7. 12

在舒声的文章“他们为什么要整学生——从工作组到校文革到宣传队的一脉相承”
(载于丛璋等编自印本《燕园风云录(四)》，2016.8)里说：

“1968年7月23日的《新北大》第三版：‘我校首次公审现行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牛泰升、王忠林、徐运朴’，把学生牛辉林、王忠林、牛泰升、李怀进、王明德、屈长江、徐运朴、何本芳、唐竞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

井冈山兵团总部委员、俄语系研究生徐运朴等人被校文革派人以权力机构名义从外地抓回北京。徐运朴被严刑逼供，被打断腿后屈打成招，为了苟全性命，承认了所有加在他身上的“反革命罪行”，这些可怕的“罪行”在当时足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校文革召开全校大会对徐运朴等人进行批斗，新北大公社把徐运朴装在竹筐内，抬到台上批斗，徐的身心受到极大创伤。徐运朴毕业后罕与北大人来往，40多岁就英年早逝。宫香政同学，这份所谓的《认罪书》是登载在校文革的机关报《新北大》上面的，徐运朴等人是以校文革的名义发出逮捕令、以宫香政等人为首的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派专人去外地抓获押回北大的，宫香政等新北大公社武斗队领导人在迫害徐运朴等被关押在新北大公社监狱里的井冈山成员、酷刑拷打、栽赃陷害他们为现行反革命集团成员上，有着不可回避的责任。

11. 宫香政等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领导人

应该厘清他们在北大武斗中应负的责任

宫香政同学作为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暨新北大公社武斗副总指挥和西线武斗总指挥，在四个月的北大大武斗期间，应该做了下列各项工作：

- 参加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总部会议，决定围剿井冈山兵团的战略战术；
- 参加并主持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会议，和西线武斗指挥部会议，决定围剿井冈山兵团的具体方针；
- 训练钢一连、革命工人兵团等新北大公社武斗队；
-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冲击在海淀路边作为井冈山楼群唯一出口的37楼前的校墙豁口；
-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抓捕从37楼走出的、在海淀路行走的、在海淀镇购买食品的井冈山成员；
- 指挥新北大公社武斗队拦截为井冈山运送粮食和物资的一切车辆，攻击运输和保卫车辆的人员；
- 派出武斗队在北京市的大街上抓捕、殴打井冈山成员；
- 派出武斗队到住在北京市的井冈山成员家中抓人；
- 派出新北大公社人员到外地抓捕井冈山兵团骨干成员；
- 在新北大公社占有的楼群里关押井冈山人员及非井冈山非公社人员，并对他们酷刑逼供；
- 其他危害井冈山成员及非井冈山非公社人员的行为。

以上行为也许不都是宫香政同学的职权范围，有些行为在其他新北大公社负责人的职权范围内，但是我相信，宫同学了解其中的大部分事件。如果我们这些被公社武斗队紧紧围绕在井冈山楼群里的井冈山人都有所了解，新北大公社身居要职的宫同学岂能一概不

知？宫香政同学若能敞开胸怀，把你所经历和了解的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的武斗内情都说出来，不啻为对北大文革史的一大贡献。

12. 宫香政为什么被定为“三种人”？

宫香政文中说：

“俞小平先生在文中说：“在文革结束后，井冈山成员没有一个被判刑或定‘为三种人’，这在高校群众组织中是罕见的。”俞小平先生想以此证明井冈山是正确的一方。但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文革后在北大进行的清算，有着深刻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倾向，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不想细说。”

宫香政同学这段话是出于对我的观点的毫无根据的猜想。我从来没有说过北大文革中井冈山是“正确的一方”。文革发动的动机是错误的，两派成立的宗旨是错误的，在政治大局上哪里会有“正确的一方”？两派犯错误只有多与少的区别，不是有与无的区别。希望宫同学不要在我的行文中想象出我没有表达过的意思。井冈山犯的错误少，没有人刑事犯罪，重要原因是没有掌权，没有被文革中的无限权力所腐蚀。错误需要检讨，罪行需要清算。非法致人死命，非法抓捕、非法剥夺人身自由、非法酷刑逼供，在任何时候都是犯罪行为，都要被清算。“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当时做这些事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历史的报应。毋庸讳言，文革后清算文革中的罪行和三种人确有政治倾向。同样的罪行，在政界有背景的逃过去了，没有背景的只能去坐牢。但是如果你没有犯罪，没有伤害人命，谁能把您送入牢房？

我说“在文革结束后，井冈山成员没有一个被判刑或定‘为三种人’，这在高校群众组织中是罕见的。”这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因为井冈山兵团从总部到个人，都以人命为重，在武斗中确实避免采用可能伤害人命的方式，既没有打死人，也没有重伤人。井冈

山人只想自卫，通过校内的武装割据保卫自己，熬到校文革承认我们的生命权利和政治权利为止，熬到“伟大领袖”表态为止。

宫香政同学文革后被定为“三种人”，开除党籍，撸掉官职，至今满腹怨气。宫同学有没有想过自己在北大武斗中的责任？身为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新北大公社武斗副总指挥、西线武斗总指挥，在四个月的大武斗里，策划、指挥了多少次武斗，抓捕、关押、刑讯、迫害了多少北大师生，做了多少违法的事？宫同学只有深刻反省自己的行为，方能心平气和，不再抱怨。如此，北大文革的过来人，你的非法行为的受害人，方能不再计较这些昔日往事，方能“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宫香政同学以为如何？■

注：本文所引用的文献都可从本文所提及的文章中的注释里查到，故不另作注释。

写于2017年5月28日

2017年7月14日修改

【评论】

答宫香政同学质疑

艾群¹

校友转来宫香政同学网文《文革中我所经历的北大武斗——兼与俞小平、陈子明、林爻、艾群先生商榷》（载《记忆》182期），宫香政文中对我所写《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提出质疑，我的答复如下。

第一个问题，即宫香政所说“如此重要”的问题。其网文称：

艾群在《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中的如下资料：“据聂元

¹ 艾群，男，北京人。1963年至1968年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公安工作，历任公安部人民公安报社副总编辑、公安部群众出版社总编辑，2005年退休。高级记者，一级警监。

梓在司法机关的询问笔录显示，3月28日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几名主要头目来临湖轩找到聂元梓，强烈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我在《燕园风云录》（四）中，读到了艾群的这篇文章……请问艾群，“聂元梓在司法机关询问笔录”是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情况下的笔录？该“笔录”多大的真实性？是不是逼、供、信的产物？你引用的是询问者的话？还是聂元梓回答的话？聂元梓本人有签字吗？如此重要的证据，如果你有复印件或全文抄录件，请你将其公布出来，让读者来分析判断，而不是用片言只语，以讹传讹。当时我是总指挥之一，校文革和公社的一帮头头们到临湖轩去找聂元梓、要求武力解决问题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的回答是——

宫香政所指的上述内容，我采访并公开发表于1986年。按照司法机关的规定，采访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这类内容，须事先向司法机关主管部门（下称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说明采访内容、采访目的等。获批后，主管部门还要当面告知：（1）哪些内容可以查阅，哪些内容不可以查阅。（2）卷宗不可以拍照，不可以复印；如有抄录，其内容须经审阅允许。（3）使用卷宗内容，是直接引用还是间接引用，或者引用大意，均须主管部门批准。（4）稿件写成之后，须经主管部门审阅批准之后方可拿出发表。此外，在阅卷室内贴有阅卷规定，还张贴着“不得拍照，不得复印”的大字告示。

我的采访和写稿，完全按照司法机关规定程序完成。稿件经司法机关批准后，交付刊物，审稿过程遵循新闻出版署的规定，于1986年公开发表。程序上的缜密合规，确保了内容的客观真实。

文章面世后，多家报刊转载、转摘和引用，另有多种图书收录。尔来30余年，从没听到有人质疑。其间聂元梓本人也看过我写的载有相关内容的文章，对这段内容没有提出质疑。

宫香政所看到的《加减法模糊了历史真相——重读〈聂元梓回忆录〉》一文，是30年后

于 2016 年应校友之邀而写，其中使用了 1986 年采访并发表的内容。宫香政质疑的内容，即为 1986 年采访并发表的内容，也就是按照司法机关规定、按照新闻出版署规定采访并公开发表的内容。

宫香政问：“当时我是总指挥之一，校文革和公社的一帮头头们到临湖轩去找聂元梓、要求武力解决问题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呢？”

我的回答是，因为你没有必须知道的资格。聂元梓是校文革主任，是全校的最高领导人；你只是担任某个群众组织的临时职务——武斗总指挥，而且还是“之一”。校文革主任做什么事，有必要一件件告知你这个“之一”吗？《聂元梓回忆录》40 万言，对你这个“之一”未着一字，可见你在她心目中是什么地位。她作决策，没必要告知你这个“之一”。

宫香政说：“在给聂元梓的刑事判决书中，根本没有和武斗相关的内容。”

我的回答是，判决书中没有的内容，不等于事实上没有发生，也不等于卷宗中没有记载。判决书 3 千余字，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十几万字，必须囊括吗？能够囊括吗？事实上，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和《聂元梓回忆录》对聂元梓指挥武斗均有翔实的记载，只是人民法院根据判决书的需要，没有一一列举而已。再者，聂元梓因写“第一张大字报”而名扬天下，成为“文革”标志性人物。但是，这件事在判决书中只字未提。按照你的逻辑，写第一张大字报这件事判决书中没有，事实上也就不存在，这逻辑能成立吗？

宫香政问：“是不是逼、供、信的产物？”

我的回答是，在聂元梓反革命案庭审过程中，聂元梓及其辩护律师没有说遭受逼供信；《聂元梓回忆录》没有说遭受逼供信；聂元梓刑满释放后，于 2003 年分别写申诉信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两封申诉信均没有说遭受逼供信。试想，但分遭受了逼供信，就聂元梓那性格脾气，早就闹得沸反盈天了，还轮得到你宫香政 30 年后置喙？

宫香政网文无意间透露出一个底牌：拼将无视事实，也要否认那个内容，为此不惜使出“遭受逼供信”的杀手锏，指鹿为马，硬说是“逼供信的产物”。

其实，宫香政的一连串问号，属于“无端质疑”，根本无需回答。我只是考虑你我是

同期同学，不妨沟通几句。正常的议事规则是，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谁质疑，谁举证。也就是说，你宫香政质疑，应该由你宫香政拿出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中没有那个内容的证据，应该由你宫香政拿出那个内容是“逼供信产物”的证据。

此外，宫香政同学解疑还有一个便捷途径：请君就此问题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你我对簿公堂，人民法院肯定能够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

第二个问题，即宫香政所说“连小孩都知道”“应该有这个常识”的问题。其网文称：

艾群在文中还说，公社一方给井冈山“断电、断水、断粮、断炊”此话不实，断电是有的，为了不让井冈山的大喇叭叫唤；断粮、断炊没有，北大的大饭厅对两派一直开放，号称数千人的井冈山若断粮、断炊得饿死多少口子？断水更没有，连小孩都知道人离开水活不了三天，我想艾群同学应该有这个常识……

我的回答是——

聂元梓和校文革武斗思维的本身，就处处违背“连小孩都知道”的“常识”。3.29武斗之后，32楼的同学给我家中打电话，告诉我学校发生武斗，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给井冈山“断电、断水、断粮、断炊”要求我尽快给他们送食品。这位同学告诉我，井冈山退守在32楼等几座楼中，这几座楼的东、北、西三面已被校文革和公社的武斗人员封锁，井冈山兵团只有西南校门可以出入。根据这位同学的要求，我买了食品，通过西南校门进校，送食品到32楼。我在32楼目睹的情况正如这位同学所说，是“断电、断水、断粮、断炊”。

断电，宫香政承认说“是有的”。那么断粮、断炊、断水，又是怎样呢？我亲眼目睹，也“是有的”。

断粮、断炊，也“是有的”。我目睹的情况是，井冈山兵团退守的32楼等几座楼之东、北、西三面已被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武斗人员封锁，他们还在楼上架设巨型弹弓对井冈山32楼等楼进行制空封锁。宫香政说“北大的大饭厅对两派一直开放，号称数千人的井冈山若断粮、断炊得饿死多少口子？”真是骑驴不知赶脚苦，如此罔顾事实。井冈山兵团守楼人员根本无法身冒矛矢之险，通过封锁线去大饭厅就餐。此外，守楼人员曾经用电炉自己

做饭，但是断电之后，自然也就断炊了。

断水，事实上也“是有的”。饮水，必须去锅炉房打开水，去锅炉房的道路被封锁，因此不能打开水，这是断了饮水。使用水，当时我目睹32楼水房和厕所都没有水，便池被堵塞（守楼同学称，一段时间后水房厕所来了水）。

我问守楼同学食物和饮水怎么解决，他们说一是从海淀镇购买，二是井冈山兵团同学大部分疏散到地院等兄弟院校，那里的同学送来食物和饮水。至于断电，后来井冈山兵团组织了一次夜间突击接线，把校外的电源引进楼内，解决了用电问题。

值此，我再次强调本人于1986年采访并公开发表的那段内容：

据聂元梓在司法机关的讯问笔录显示，3月28日夜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几名主要头目来临湖轩找到聂元梓，强烈要求集中优势兵力武力解决，聂元梓明确回答：“打，你们要打，就打吧！”这是一个无可置疑的武斗进攻令。

上述内容的采访和公开发表，符合司法机关规定要求，符合新闻出版署的规定要求。程序上的缜密合规，确保内容的客观真实。1986年采访并公开发表以来，30余年没有质疑反馈。而今宫香政同学提出质疑，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请宫香政同学拿出聂元梓反革命案卷宗中没有这个内容的证据，请宫香政同学拿出这个内容是“逼供信产物”的证据。■

注：我的原文是“司法机关讯问笔录”，并非宫香政引文中的“司法机关询问笔录”。

【读 书】

评王复兴的《抢救记忆》

舒 声

原北京大学历史系 65 级学生，现居美国的王复兴先生 2016 年写了一本《抢救记忆——一个北大学生的文革回忆录》，在一些网刊上部分连载，产生一定影响。笔者作为他的校友，亲历了北大文革，认真地阅读了全书，对该书有以下几点评论。

一、该书的可取之处

1. 该书第一章《文革前夜》，记述了在作者在北京四中学习期间学习九评、学潮和社教的情况，提供了一些文革前夜发生在中学的实际情况，认为“文革确实发生在文革之前”，“四中的学潮和社教是文革红卫兵运动的序幕和预言”（该书 35 页），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2. 该书的第二章《1966 年：文革爆发》记述了北大历史系开展文科试点，下乡半工半读，搬到昌平太平庄，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晚上政治学习或开展史学批判，以及邓拓、宋硕、陆平、彭佩云、翦伯赞等 2 月 1 日参加开学典礼等情况，应是北大文革前夕的真实记录。
3. 作者的祖父王卓然是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东北帮”元老之一，1968 年被关入秦城监狱，父亲王福时解放前在美国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一些活动，1957 年被打成右派，弟弟王复光 1968 年 8 月 2 日在海南兴隆农场被对立派的民兵队长开枪打死，作者一家都是文革前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受害者，这些遭遇都值得同情。
4. 作者虽然“出身不好”，但却不像别的同类学生那样在文革中谨小慎微，而是积极地投入文革，得到风云人物聂元梓的信任，有时还特地带他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他和孙

蓬一、李清昆、宋一秀等北大文革重要人物都有交往，并组织了跨系的“红旗兵团”、“66串联会”等组织，因此比一般群众了解情况多一些，在书中提供了一些“记忆碎片”，并试图把这些碎片拼接起来，虽然拼接的并不成功，但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这种“抢救记忆”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5. 作者作为北大文革中“新北大公社”一派的重要成员，虽然自始至终拥护校文革和聂元梓，但在面临武斗这样重大的问题上，反对校文革和公社中的极端分子的做法，反对武斗，这一做法无疑也是可取的。

二、该书存在的问题

1. 关于校内两派的形成和矛盾

凡是有一定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是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只是变化的次要因素。校文革成立之初，全校绝大多数群众都是拥护支持的，聂元梓这个得到最高领袖支持的“左派领袖”声望如日中天。但是聂元梓掌权后便得意忘形，独断专行，在校文革内拉帮结派，排除异己，先后把昔日的“战友”孔繁、杨克明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清除出校文革，又把不紧跟他的聂孟民（副主任）、牛占文、刘宗义、廖淑明（常委）赶出校文革（《新北大》1967年2月14日）。在1966年底到1967年初，残酷打击反对她的群众组织井冈山、红联军，把杨勋、杨炳章、乔兼武等送进监狱，残酷批斗中文系学生陈一諧，逼死中文系女生沈达力。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把善意提出意见的郭罗基打成“机会主义分子”。在文革中设立劳改大院（牛棚），关押大批干部、教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连被中央明令保护的科学家周培源也被他们打成“美国特务”，设立专案，并企图抄家抓捕。事实让许多有良知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北大群众认清了校文革和聂元梓的真面目，毅然走上反对聂元梓的道路。例如笔者和班上大部分群众原来都是支持校文革和聂元梓的“北京公社”成员，1966年11月1日，在东大操场还举

办过纪念“第一张大字报发表 5 周月”纪念大会，由我班同学程某某主持，请聂元梓发言，会后程同学拿出毛主席语录本，恭敬地请聂元梓签字留念。但是从 1967 年 3 月整风后聂元梓那种文过饰非、死顶硬抗、排斥异己的做法令人实在失望，许多人不得不走上反对她的道路。王复兴书中说的“北大 3 月的整风波浪，使新北大公社出现一道裂缝，到了 6 月 5 日，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来到北大，看准了裂缝，蓄意投下一颗巨石，要把他所说的北大‘一潭死水’掀起‘大风大浪’，从而造成北大的大分裂。”（144 页），则过分夸大了陈伯达讲话的作用。事实上，在陈伯达来北大之前，北大已经有几个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群众组织成立了，即使没有陈伯达的讲话，北大两派也是要分裂的。而死保聂元梓和校文革“红色政权”的人，当时固然是受到“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热爱我热爱”思想的影响，情有可原，但是现在还抱着原来的思维方式，继续支持聂元梓，甚至为其辩护，这种认识是否太落伍了？

2. 关于聂元梓反对潘、吴就是“反中央文革”、反“极左路线”

近年来原新北大公社动态组长胡宗式连续在网刊《记忆》上发表文章，宣扬聂元梓在文革中反对潘梓年、吴传启，并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反对潘、吴就是反对王关戚、反对王关戚就是反对中央文革，所以聂元梓在文革中不仅无过反而有功。王复兴在书中延续和重复了胡宗式的逻辑，他写道：“1967 年 1 月至 9 月，在北京、在北大，从上至下，曾经存在过反左与反右之争。而先知先觉者抵制极左路线，反极左思潮是历史进步因素，具有重要意义。”“1967 年，以聂元梓、孙蓬一、“新北大公社”为代表的一派，抵制了极左路线，冒着极大风险，以进攻姿态，反极左思潮，反吴传启，反林杰，反谢富治，这是历史事实。”“客观上，新北大不自觉地抵制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见该书 185 页）把聂元梓等人打扮成了抵制极左路线反极左思潮的“先知先觉者”。

而事实是自从 1967 年 1 月上海造反派掀起的夺权风暴后，聂元梓积极活动，亲自出马，联络蒯大富、王大宾等人，勾结洋造反派头头李敦白，企图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见

张从“胎死腹中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一文，党史博览，2016年第2期，26-27），并派出人马到一些中央部委去夺权，在夺权的过程中遇到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简称学部）吴传启一派和北师大井冈山谭厚兰一派的反对，形成了矛盾。在文革中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凡事都要追后台，聂元梓等人把吴传启和谭厚兰的后台定为林杰、关锋等，从而形成这样一个逻辑：反吴传启就是反林杰、关锋，就是反王关戚，就是反中央文革，就是反极左路线。这种逻辑当然是不能成立的。聂元梓不在北大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而是到处伸手夺权，甚至想当北京市的一把手，和谢富治发生矛盾，这种情况至多只能算是“争权夺利”而已，算得上什么反极左路线的英雄？聂元梓是在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康生等的扶持下才当上北大校文革主任和造反派领袖的，1967年还当上了首都红代会核心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她对最高领袖和中央文革感激涕零，俯首听命，怎么会去反对中央文革和抵制最高领袖的极左路线呢？

3. 关于对聂元梓错误和罪行的认识

作为文革发动者和中央文革的在北大的头号代理人，聂元梓在文化革命中犯下了严重错误甚至罪行，导致她在文革后被判刑17年。在彻底否定文革和清算文革灾难，回顾总结北大文革历史时，必然要对聂元梓和校文革进行批判和否定。但在王复兴的书中，总体上对聂元梓充满同情，对她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轻描淡写，在一些问题上却千方百计地为其辩护甚至美化。该书说：“聂元梓的最大错误，是从1966年5月至1967年1月，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反陆平，反彭真，反工作组，反上海市委，坚决批判资反路线，坚决炮打刘邓司令部，犯了左倾政治思想之错而不是右倾”（130页）。意思就是聂元梓只是在这半年多有政治思想错误，而其后就没有什么错误了。该书还说：“当年聂元梓、孙蓬一领导的校文革、新北大公社广大师生，其斗争方向与中央文革正相反，斗争矛头不是指向老干部重点‘走资派’，而是指向中央文革中的‘极左派’；不是反右，而是反左。它属于人民的文革。它实际上是抵制了毛泽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1页）更是罔顾事实，

对聂元梓、孙蓬一和校文革的恣意美化。事实上聂、孙和校文革在反“走资派”方面做的不比任何造反派组织差，他们第一个贴出反邓小平的大字报，第一个在校刊上点名批判朱德同志，他们把持的舆论工具《新北大》大量刊登“揭发”“批判”党和政府、军队领导人和政府部门负责人的文章，据统计，被他们点名批判的有：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彭真、谭震林、罗瑞卿、习仲勋、李雪峰、李井泉、王任重、陆定一、胡乔木、杨成武、傅崇碧、廖汉生、吕正操、王恩茂、黄新廷、荣高棠、周荣鑫、周扬、齐燕铭、刘仁、万里、邓拓、吴晗、赵凡、冯基平、杨述、廖沫沙等，其中很多人点名的时间还抢在其他报纸的前面。就在该书说的聂元梓“反左不反右”的1967年4月，聂、孙在校内组织多次批斗大会，批斗彭真、陆定一、李维汉、徐冰、刘仁，万里、许立群、韩光等老干部和王光英等民主人士，7月14日，又把胡耀邦、胡克实等共青团中央的干部揪到北大批斗。（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更为严重的是聂孙在校内残酷迫害广大干部教师，镇压不同意见学生的错误和罪行，挑起和制造武斗，造成大量干部、教师、学生非正常死亡和残疾。至于聂元梓实行个人专制和愚民政策，破坏了北大长期形成的科学民主的传统，给北大师生造成的精神和道德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估量的。

该书作者总体上否定文革，但在具体问题上又试图为文革中的代表人物犯的错误和罪行开脱，甚至美化，这就使作者陷入逻辑混乱和自相矛盾的境地。

三、该书存在的不符合事实之处

1. 该书写道：“在1966年6月中旬，哲学系66成员”顶风船队长赵某某和史某某俩人找我，他们表情严肃，告诉我，他们在“红旗飘”总部办公室窗外，偷听了牛辉林等人讨论形势。牛辉林分析：当时中央的路线斗争是新文革和旧政府的斗争，周恩来到处救火，灭火，保护老干部，是新保守派的总后台。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就是保周的新保皇派。他

们要反聂，反周，造反到底（这就是牛辉林“红旗飘”秘而不宣的纲领）。（该书165页）。且不说文中所说的1966年6月的时间不对，那时还是工作组时期，“新北大公社”和“红旗飘”根本没有成立，也不说牛辉林的宿舍是在三楼楼上，根本没有什么总部办公室，那两个人能在三楼窗外偷听吗？即使是他们偷听到了，这些只言片语能够作为证据吗？把几个学生在一起议论的几句话就作为“秘而不宣的纲领”，这个结论能够成立吗？

2. 该书叙述1966年9月，历史系23名教师干部被系文革送到太平庄劳改，竟说“太平庄的劳改营既清静又安全”，“按郝斌回忆，比起燕园牛棚时的挂牌劳改，被人围观、辱骂，在太平庄倒是清静了许多，少了许多侮辱。”“像北大校园那样整天的追逐、围斗，就幸免了。”（该书79页）把太平庄描写得似乎是世外桃源。可是作者在这里完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是断句取义，因为在郝斌所著的《流水何曾辨是非》一书中，“就幸免了”后面不是句号，而是逗号，紧跟着就写道：“可监管的学生又想出了新招。我们一日三餐，餐前要在毛主席像前列队，弯腰低头，由被制定的一个人朗读一段语录，而后我们一起喊：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接着，一个一个地分别报出自己的姓名，但在姓名之前，要加上自己的‘帽子’。”之后，又叙述了监管学生如何批斗辱骂向达先生，如何半夜在断崖上斗争杨人楩先生等事实，以致在从太平庄回校不久，向达先生就因病救治不及而去世。（郝斌：《流水何曾辨是非》，大块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79、89页）。1967年，周一良、郝斌等历史系教师，又被二次押回太平庄，一关20个月。“其中约有半年可称得上是暗无天日。监管学生不但人数大增，而且手里还添了长矛和用自来水管加工改制的短棍。一天之内，我们要7次列队集合，7次背诵‘语录’。其中晚点名一场，总要喊出一两个人，轻则斥骂，重则动手。”“1968年6月的某日，监管学生聂玉海对着周一良先生，一个嘴巴就抽过去，周先生的嘴角立即流出血来；跟着左右开弓，周先生满脸是血。（郝斌：《截屏一瞥周一良》，江淮文史，2017年第一期，37页”。王书又说：“近年郝斌曾向在某大学任教的高海林隔空喊话，要高海林忏悔，道歉”（该书80页），也是搞错了人，喊话的不是郝斌，而是周一良先生，后来周与高也并未相逢，所以该书说“历经劫难之后，周老师与学

生高海林能相逢一笑泯恩仇，实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实现和解的一件美谈”（王书第82页），也是夸大其词。正如郝斌先生说的：“周先生的海量，说来也不比曼德拉狭小多少，可他成就的不是佳话，却是个“剃头的挑子”！（郝斌：截屏一瞥周一良，江淮文史，2017年第一期，46页）

3. 该书记述“3月29日（1968年）北京卫戍区副司令李钟奇到北大视察，制止武斗，聂元梓陪同。他们走到28楼“井冈山”总部楼下时，迎面走来3、4个“井冈山”的人，动手就打。李钟奇的头部被打了一个大包。有人用刀子划伤了聂元梓的头部，血流了一脸，染红了上衣。后经检查、包扎，只是皮外伤。”也完全是道听途说，毫无根据。具体情况，当时在现场，后被污蔑为“刺杀聂元梓的凶手”的化学系63级学生樊能廷和经济系学生蔡华江有专文记述（见《燕园风云录》第三集，樊能廷：北大刺聂真相，6-17，蔡华江：我所见证的“刺杀聂元梓事件”，17-19），说明所谓刺杀聂元梓的事件纯属子虚乌有。

4、该书第100页写道：“66年12月至67年2月“井”、“红”、“主义兵”垮台、解散，当时校文革并没有把“井”、“红”打成“反动组织”，也没有把对立面学生打成“反革命”，那些说法都夸大其词，不符事实……。一般没有给他们戴什么反动分子的帽子，更没有入“档案”，那时档案管理已停了。”这种说法也不符合事实。1967年2月1日《新北大》第一版到第四版刊登了长篇文章：“彻底清算北京大学红联军、井冈山的别动队虎山行的反革命罪行”，点了学生杨作森、卞宗美、吴可、刘秉慈、尹火、吕润请、王山米、魏秀芬、王志新的名；1967年2月7日第一版：“北京大学井冈山红联军一小撮反动头目的丑恶嘴脸”，点了教师杨勋和学生杨作森、魏秀芬、乔兼武、张西玲、路远、周闯、杨绍明、邓朴方、卞宗美、刘秉慈、尹火、王山米、赵丰田、王棉棉、俞启义、陈延成的名。这些学生分别在校、系系会上遭到批斗。文革中虽然正常档案制度暂停了，但校文革的保卫组（二组）一直在整干部和学生黑材料。1967年7月10日，部分群众查抄了二组，在查出的材料中，仅整“井红”的材料就有56斤重，其中有“井红反动言论集”13集，每集都有100多页，“井红”的主要负责人张志握、俞启义、赵丰田等，每个人都

有“反动言论集”。哲学系65级学生罗雪莹参加“红联军”仅10几天，就有了厚厚一叠子材料，其中有一条罪状是：“去年8月底，作为哲学系文革委员的罗雪莹带领20多人外出串联，破坏了哲学系的运动”。在燕南园63号的澡盆下，发现了被隐匿的一份卷宗，日期是67.5.6，黑体字是“反动学生的材料”，目录上列了10个人，中文系62级女生沈达力被列为第5名，她已经在1967年3月17日被迫害自杀了，校文革二组依然不放过她。

（1967年7月26日《新北大报》第三版：“彻底砸烂北大的特务机构—黑二组”）

至于该书中由于不严谨出的错误更是不胜枚举，仅就笔者发现的列举如下：

1. 该书第7页：“1986年9月，父亲从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图书馆主任一职离休时，关于何时参加工作的问题，是由乔冠华、刘思慕、刘尊棋等人出的证明，证明父亲是于1948年参加的革命工作，是从在美国发行《远东通讯》算起。”经查，乔冠华是1983年逝世的，怎么可能在1986年为王父出证明呢？

2. 第43页：“那时（1966年6月）北大校园内，人群熙熙攘攘，入夜还有许多小商小贩推车叫卖做生意，有卖茶叶蛋的、煮花生的、热包子的。按现在说法，有点像大型嘉年华。”实际情况是上个世纪60年代，城乡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根本不允许小商贩活动，北大校园里从来没有这些个体商贩出现过，而且买粮要粮本粮票，鸡蛋、花生都是定量供应的，小商贩也不可能卖这些。

3. 第67页“孔繁、杨克明、徐运朴、侯汉清后来退出校文革，也没有想着征求选民意见”。孔繁、杨克明是被聂元梓操纵的校文革开除的，并非自己退出的，徐运朴、侯汉清后来参加了井冈山兵团，也没有自己宣布退出校文革，更无法征求选民意见。

4. 第170页，1967年8月17日，成立了“新北大井冈山兵团”，核心组成员有周培源、侯汉青（应为清）、徐运朴、孔繁、杨克明、郭罗基、牛辉林、陈醒迈、靳枫毅等11人，有误，孔繁、杨克明当时不是核心组成员，他们是1967年11月18日才参加井冈山兵团的。

5. 第210页，说“东总”骨干刘澜波是水电部长、于毅夫是统战部长，都有误，他们

文革前都只任过副部长。

6. 第108页，101中美术教师陈南昆被殴打致死，应为陈葆昆；109页北工大的谭立夫应为谭力夫，99页樊立群应为樊立勤。

类似的错误在该书还有多处，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由于作者主观、客观方面的局限性，这本书是一部片面性很大的作品，不能告诉读者一个真实全面的北大文革，如果想要获得北大文革历史的真相，还需要得到更多的信息，希望更多的亲历者和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写出自己所了解的北大文革情况，给读者和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

【读书】

人民的文革，还是被文革愚弄和诱惑的民众？（节选）

——与王复兴学兄商榷

吴根耀

饶有兴趣地拜读了王复兴学兄¹的《抢救记忆》一书（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6年香港出版）。它在50年后向我展现了当年北大文革的若干画面——尽管我在校，却是个逍遥派，许多事竟然一无所知。书中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如“文革之前有文革，文革之后仍文革”和“北大的社教，初期与六中类似晚期与四中类似”等，耐人寻味。

文中还提出了“毛泽东的文革”和“人民的文革”的概念。这两者“……在改良方向上是对立的。人民的文革追求的终极目标是平等、法制、人权、安宁，这不符合毛的文革要大乱、大治、革命、专政的宗旨，这便决定了人民文革失败的命运”（P.127）。

¹ 王复兴已满头白发，理应尊称他为先生；只是笔者也是北大学子，感到称他学兄似更亲热些。以下的文字，权作师兄弟们坐在博雅塔上观（未名）湖聊天，不是“华山论剑”。

书中还以时间为序列述了“人民的文革”的3个实例。1) “人民的文革，虽然脱离了毛泽东的旨意、部署、纲领，但文革中从来也没有出现过推翻国家政权、改变整个体制的大规模人民运动。既(即)使在1966年10月至12月的全国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中，‘人民的文革’也并不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P.126)。2) “从1967年下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全国各地都陷入了派别斗争，武斗升级，运动严重失控。这并非毛泽东的愿望。这证明文革并非始终如一的‘毛泽东的文革’”(P.199)。“那段时间的人民的文革是个错误潮流，……离开了毛泽东的文革轨道”(P.200)。3) “四五天安门运动是一场自发的人民革命运动，……它要求结束文革，终止浩劫，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历史主动性，是最典型的‘人民的文革’。……谁也不能说：‘四五运动’属于‘毛泽东的文革’”(P.304)。“四五”运动“是典型意义的‘人民的文革’！它与‘毛泽东的文革’相对立，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P.305)。

所谓“人民的文革”一说，本文是绝不同意的。以下拟对上述3个“人民的文革”的实例进行剖析，重点讨论武斗问题，指出它恰恰是毛的全国性的战略部署，是名至实归的“毛泽东的文革”。

人民想发动文革吗？

1966年，刚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的中国人，惊喘初定。他们急切盼望的是能尽快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不是搞什么翻天覆地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尽管他们对官僚作风和贪污腐败有意见，无奈打天下者坐天下，谁敢造反呢？造反，重者死罪，轻者管制。57年反右斗争的教训，不是还记忆犹新吗？

毛的想法则截然不同。他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因为他感到身边已睡着个赫鲁晓夫，党中央里也存在着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他计划中的这场运动有非常繁重的政治任务，不是发一纸文件能解决的，而是必须广泛地彻底地把群众发动起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

而上地揭发我们的阴暗面，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演习。66年7月8日，他在写给江青的亲笔信中这样构思了刚开始的文革运动：“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本文对前一句话的理解是：要造成天下大乱，无非采用一文一武的两手；达到乱而后治则必须经历3个阶段：小乱小治，大乱大治，彻底乱彻底治。

所谓文的一手，就是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号召普罗大众起来投身文革。毛采取了解放思想、组织松绑、理论引导、树立典型、因势利导、步步深入、根绝后患等多种手段。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述一二。

文革之前，老百姓别说反党委，连基层党组织的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也不敢“反”（包括工作上意见的不同），因为怕被扣上“反党”的帽子。这一思想束缚极大地阻碍了文革的发动和发展。毛在66年6月2日亲自号召：“对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¹。报刊文章紧跟着宣传：党的领导就是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不管哪一级党委，只要其决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不代表党的领导，就应该抵制和反对。

中学生被毛选为大乱天下的急先锋。文革之初他们高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杀上社会。“造反有理”的恶性发展，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怀疑一切”，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可以怀疑，都可能打倒。7月下旬，中央文革号召赶走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这句话成了抵制各级党组织领导的护身符，进一步助长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泛滥。

8月5日，毛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吗？当然不是！恰恰相反，他是为了树立和巩固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的绝对权威和领导。他编造“中央内有资产阶级司令部，党内、政府内、军内都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的恐怖谎言，就是为了让大家有危机感：不搞文革不行啊，赶快起来跟着我去“炮打”！终于，民众被发动

¹ 本文中的毛泽东原话，除特别注出者外，都转引自：张万舒.2012.狂热的年代 1966-1976年红色的大陆.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

起来了，造反运动的浪潮席卷神州大地，至66年底演变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恶风黑雨，即王复兴所称的“全国炮轰各级党委的造反大潮”。这不正是毛热切盼望的吗？毛不正是利用了这一大潮在上海率先发起“一月夺权”并迅速将之煽为燎原之火吗？

原本不想搞什么政治运动的群众，在受毛愚弄而被卷入文革之后，就一直是毛文革棋盘上的棋子，是“毛泽东文革”的打手和工具，哪里有什么“人民的文革”可言？！

简短的结语

本文重点论述了1967年的武斗，指出武斗和文攻都是毛泽东“全国全面内战”这一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是为达致天下大乱而煽动两派群众夺权造成的后果，属于“毛泽东的文革”。为达到全国全面武斗，毛马不停蹄地下了5招狠棋：一是广为宣传他的动员令，二是树立上海这个夺权典型，三是号召大家去夺权，“内战”爆发，四是批示军队介入地方文革，五是试图武装“左派”民兵。江青喋喋不休地号召两派群众紧握武器，张春桥是上海砸“联司”武斗的直接发动者。这俩人在“全国全面内战”中有特别拙劣的表演。群众为夺权的欲望所煽动，部分人做出了丧失理性甚至丧失人性的疯狂举动，成了“毛泽东的文革”的炮灰。

68年的武斗确实不是毛期望的，因为他已经想“文革收尾”。但67年末解决的矛盾延续至68年，或旧矛盾在革委会已成立的情况下重新爆发，故仍属于“毛泽东的文革”。因急于“文革收尾”，毛对68年武斗处理的指导思想已经不同：67年上半年他还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68年则采用了“治乱世用重典”的手法。

为了发动群众参与文革，毛运用了“文”、“武”两手。“文”的一手，是以一系列新理论和政治愿望欺骗民众，愚弄民众不断地参加“批倒批臭黑帮黑线”、“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等等的运动，受骗者以学生和机关干部为主。“武”的一手，则是以权利为诱惑，煽动大家起来从一小撮走资派手里夺回党政财文大权。

受利诱的主要还是基层的干部群众，因为“有权甜蜜蜜，无权苦黄连”是一个再浅显不过的道理。

结论是：没有“人民的文革”，只有被文革愚弄和诱惑的民众。

正是由于文革的这种“二重性”，造成了北大出现聂元梓和孙蓬一这对文革期间的黄金组合。聂要“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光辉普照全世界”，孙则号召“念念不忘一个权字”（引号内为新北大校刊上登载的两篇文章的题目）。进一步言，毛泽东和林彪也是这样的一对黄金组合（当然是最高级别的黄金组合）。毛提出并不断地丰富完善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林则不但掌控着军权为文革的进展护航，他本人66年5月18日的“政变经”也把权欲推到了极致。“九大”召开，林在文革期间的使命即告终结了。■

2017年5月18日

定稿于北京

【述往】

难忘的燕园·1969（五）

——别了，燕园

吴琼

不能毕业分配，仍旧在北大38楼接受“政治审查”和“群众监督”，如今，未婚妻又因我被“政治审查”、受到精神刺激而病故，我感到十分内疚，情绪更加低落，在燕园里过着惶惶然不可终日的生活。好在燕园中，像我这样不知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人不在少数，就是所谓的“反动学生”也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例如，那位曾经自我揭发批

判、又揭发批判我的“井冈山”战友，以及他又向别的人散布“反革命言论”、其他人又被他揭发，从而受到了牵连的一个个男生、女生。这些学生在早晨集体跑操，在食堂三餐打饭，晚上在未名湖畔散步时，几乎都能遇到。大家都不晓得过了今日明日又如何，不晓得这种受压抑、令人烦恼的日子何时才能告结束。

白天上、下午，我总是在38楼一层那个寝室中，同学习小组里的工人、师生、干部在一起，周而复始地学毛著、讨论、“斗私批修”、“活学活用”、参加“清队”运动；只有到了晚上，回到自己住的寝室，才有条件看些自己想看的书，同时思考一些自己想思考的、有价值的问题。

在那段即将离开燕园的两、三个月里，我阅读了外面包上《毛选》的封面，而里面的内容却不同的书籍，例如，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多雪的冬天》、《州委书记》，还有从家里带来的几本内部发行的蓝皮书；也翻看了几大本非法出版的、毛泽东未公开发表的言论著作。我读这些书籍时，主要思考过这样一些问题：

列宁说过，历史喜欢和人开玩笑，人们本来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立志通过革命、专政而消灭剥削、阶级、压迫的共产党人，难道在取得政权以后，真的在党内滋生出了一个“新阶级”、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从柯切托夫小说所描写的苏联社会的情况看，在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显然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新阶级”；而从“文革”运动中各地人民群众张贴大字报所揭发的大量情况来看，中国高层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也相当严重，远非一般老百姓所能想象。所以，从这个角度分析思索，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造反有理”和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最高指示”不难理解，是可以接受的。然而，从“文革”发生发展的种种情况看，从毛泽东落实他的一系列“战略部署”的实践结果来看，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很不利。总之，“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甚至是逆历史潮流发展的一种倒行、反动。那么，究竟孰是孰非？中国要到哪里去？这确实是一个还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

再者，从毛泽东青年时代便树立起来的社会理想看，可以发现，其中早就含有一些封建社会小农“平均主义”的思想，从他后来未公开发表的《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和已公开发表的《五七指示》看，其中确实有些违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方向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如果中国真的取消了社会分工、取消了商品生产和交换、货币流通，演变成古代斯巴达那样的一个军事化的“共产主义”国家，或者演变成另一个“太平天国”，那么，很难想象中国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子。那种国家和社会形态难道是我们应该效法、追求的吗？

但是，毛泽东关于人类社会时时有矛盾、事事有矛盾，关于“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那段著名的论述，关于“有压迫就有反抗”以及“造反有理”等等论述，我认为还是正确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现实问题和将来遇到的种种问题，又必须抱乐观的态度。这也正如老黑格尔所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由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始终存在，虽然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会遇到一些特殊、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他们在实践中不断积累起经验，人民群众总会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最后也必将会胜利地解决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问题！至于国家社会中的许许多多的个人，那就正如苏东坡所说的：“茫茫太仓中，一米谁雌雄？”——每一个个人，只不过是茫茫宇宙和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粒有意识、有主观能动性的小米粒；每一个人，只要顺乎、而不是逆乎历史发展的潮流，只要为人类的进步事业、而不是为反动事业尽一己的微薄之力，那么，人生就是有价值的，就是值得肯定的。而当国家社会遇到时代难题的时候，个人有时既无法逃避，也无法反抗，有时，最好的方法只能是等待，因为，解决这类问题常常需要条件的成熟和一定的历史机遇……

已经到了1969年的10月。

一天傍晚，我走出燕园，到中关村31路公交车站附近散步，巧遇刚刚下车、冬季我逃离北大时曾经给予我帮助的郑金铃。她主动和我打招呼，问了问我目前的情况，还挽起我

的手臂，一起到中科院那树影斑驳的林荫路上散步。我向她诉说了明明去世的情形和目前的郁闷心情。她劝我不能这样消沉，还是要积极乐观起来，同时，她提出愿意作我的朋友。我答应了。

但也就在我和郑金玲巧遇的第二天下午，军工宣队把全校师生员工集中在大饭厅，召开了紧急大会。会上，军工宣队传达了“副统帅”林彪关于加强战备的紧急指示和“一号命令”。随后，在一周之内，北大各系师生向外地疏散。哲学系教师大部分去了江西鲤鱼洲。学生们去了北京房山。燕园里一下子变得冷冷清清，路上很少有行人，一派萧落的景象。

一天晚上，北大军工宣队学生专案组的几个负责人，把七八个系的十几个所谓问题最严重的“反动学生”（其中还包括有研究生），集中到哲学楼的一间教室里，传达了对这些人的处理决定：第一，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第二，揭发材料全部销毁；第三，先去河北宣化4630部队军工厂劳动锻炼一年，一年后，分配工作。……此后，又过了两天，就在38楼哲学系军工宣队的办公室里，在专案组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我亲自点火，烧掉了揭发我的全部材料。在焚烧那些材料时，我注意到，那些揭发我的材料并不多，全部材料只装在一个“卷宗”袋里。

1969年10月的一个普普通通的早晨，一辆深绿色的车用卡车驶出北大的东南校门，驾驶室里有两位司机，他俩都是河北宣化4630部队的现役军人。军用卡车上站立有不到20位终于获得解放的北京大学研究生和大学生。这辆卡车向中关村西北的方向驶去。当这辆卡车正开始加速的时候，站在卡车上的我，忽然看到前方马路旁的人行道上，迎着卡车正在行走上班的小学教师郑金玲。她穿着一身浅黄色的毛料衣裤，她居然看到了站在卡车上的我，于是边微笑、边向我挥手。我也边微笑、边向她挥手……

别了，燕园。 ■

【述往】

一个普通红卫兵对人民大学的文革回忆（七）

——家乡上海

陆伟国

绕了这一大圈之后，我要回家了。

11月10日，从青岛坐船回上海，又在大海上航行了两天多。真的看到了辽阔浩瀚、无边无际的蓝天大海，看到了大海上绚丽多彩、光芒灿烂的日出日落。我喜欢大海，陶醉于大海。没想到，这条航线，以后我来回乘坐了许多次。再后来，进入我生命的妻子，她的家就在青岛东北面不远的海边，出门就能看到大海。按现在的说法，真的就是海景房（当然，现在不行了，早就被挡住了）。大海，就此和我永远地联系在了一起。我的长篇小说《革命四十年》，就是以那儿为社会背景和地理、历史背景写的。

当轮船从吴淞口缓缓驶入黄浦江，那绵延几十里的数不清的工厂、码头、楼房，叫人目不暇接。我就像一个外乡的小青年贪婪地看着两岸的一切，使我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自己的家乡。《革命四十年》第二卷第十六章车素花和她儿子来上海看望负心的南下干部经乡长，也借用了这个场景。

回上海后，跟高中的同桌去过闸北的上海钢笔厂和杨树浦的国棉十二厂劳动。春节前，在钢笔厂。这个厂的生产秩序还很正常，没受到运动多大的影响，也没有多少的大字报。最多也就是我们在中间工休时间给师傅们念念报纸。这个厂基本上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配有一些简单机械，大量是手工劳动。春节后，去的棉纺厂，也是正常上下班，不过气氛已经大不一样了。厂区里到处都是大字报，主要内容是：不许压制工人闹革命，

工作组滚出去，我们也要起来造反了。也开始有小规模的站在板凳上批斗车间领导、班组长这些，看上去也就是老师傅、纺织女工的模样，怪可怜的。但我们没有参加他们的运动，只是看看而已。

国棉十二厂靠近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那段时间正是他起来带头搞“一月夺权”的时候。不过那时他在纺织系统内，声名还没有鹊起，影响并没有外界看的那么大。他主要是联络外系统的一批“勇敢分子”，紧跟张春桥，直接大闹市委、市政府，引起了最高层的注意，在这之后的“文革”洪流中便迅速崛起。

可能是当时的境况与1966年初在北京工厂搞实践教学时大不一样，我们所接触的上海工人与北京工人的那种爽朗也大不一样。显得很压抑、很茫然，对事态的发展很不理解，但也不提出异议，整日默默无语，下了班赶紧低头就走，搞到谁头上，也只是低声哭泣而已。或许我们没有接触到造反那一派的工人兄弟们。

工厂的劳动条件也很差。为了保持棉纱的牢度，棉纺厂的车间里，又潮又闷又热。尤其是机器轰鸣的噪音很大，对着讲话非大声就听不清。然而，尽管社会环境已经风浪四起，可工人们还是在默默地勤勉地劳动着，无怨也无奈地劳动着，为自己，为自己的平安，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家人。这社会，也因为有他们的勤勉而维系着、支撑着、延伸着，而不至于垮塌。也正是他们的勤勉，才创造出被一些“文革”赞许者所称颂的“文革”期间也有成果：钢铁的冶炼、石油的开采、大桥的合拢、粮食的收获。这些应该感谢那些在重压下，在政治和生活重压下，依然勤勉地劳动着的工人和农民兄弟们，而决不能记在“文革”的头上。不否定改革开放前后的各个历史时期，不等于不否定文革。就像肯定解放战争时期，不等于肯定当时的蒋介石政权。其实，作为一个历史时期，也是一个时间段，里面发生着许多值得肯定和需要否定的事情。一个历史时期本身不存在肯定与否定的问题。

这期间，我还去看了中共一大会址、作为新市区样板的闵行一条街、江南造船厂的万吨液压机等等的地方。所谓闵行一条街，现在看来也就是二、三百米长的一个小区，

一个典型的形象工程。如果真的是为民生着想，为何改革前的几十年里，对外援助的金额竟然超过了居民住宅建设的总量。而那时城镇居民的住房拥挤程度，都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在普查学习材料上举了个例，什么叫一户。昆明市一位老太太有五个女儿、两间房。女儿们都结了婚却没有房，只能每周轮流领自己的丈夫回家过一晚上。可户口本上还是这一户人家有两间房。我的一位上海邻居，母女俩都是成年人，就住在木板楼梯的下面，只有一张床，床上一个箱子，床下一个马桶，连两平方都没有。

此外，就在外滩、南京路、淮海路这些地方看看大字报。戚本禹的垮台，就是从上海马路边的大字报上看到的。作为一个上海人，还从没有这样从容地在自己家乡逛悠过。

然而，“一月夺权”之后，上海逐渐为张春桥一伙所掌控，反抗、争斗、镇压日益加剧，形势日益严峻。一天，我哥哥竟彻夜未归。那时没有手机可联系，情况不明，完全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家里人都急死了。直至天明，才回得家来，原来又在搞一场全市性的“刮十二级红色台风”，单位里的人都不许回家。

街上已有造反派的“工人民兵”站岗巡逻。整个城市，一片肃杀之气。

走吧，走吧，还是回学校去吧。

到北站一看，乖乖，车站的出入口，竟都是一排排戴着柳条帽的武斗队。一色的蓝色工装，胳膊上戴着“上海工人民兵”的红袖章，手里竖着一根根长矛，脸上都是一副傲慢、凶狠和不可一世，就像外国占领军一样。说起来这些人也还是自己的老乡，可是“老乡”这个词还有多大的意义吗？被自己同胞奴役，就不是奴役吗？

这还是我可爱的家乡吗？家乡还好吗？

——家乡不好了。家乡能不好吗？

——不是家乡不好，是笼罩在家乡上空的乌云不好。

无论是哪个家乡，淹没在乌云的阴霾里，都不会好的。我的家乡也是这样。■

【述往】

我的回忆：关于地院文革（十一）

——我被隔离审查

宋翔雁

一、“五一六”嫌犯

七零年十一月中，军宣队在全校揭发批判“五一六”的动员大会上，公开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学习班”，多么文绉绉的字眼、多么美好的名称，但它无论如何也无法掩饰军宣队在抓“五一六”运动中，残酷迫害、凌辱地院广大教职工的血腥事实。尽管在我姐和我谈话后，我有被揭发、被批判甚至被批斗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但有两点是我没有料到的：1、如此之快运动的矛头就指向了我；2、在不公布任何调查取证材料的情况下，竟立即对“嫌疑人”（这是我按现代的法律程序起的名称，当时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时，就是直呼对“五一六”分子如何如何，似乎对我已经定性了一样）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的隔离方式，强迫我揭发和交代问题。这充分说明了我在政治上的幼稚，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不按常理出牌的突发性，缺少认知，竟想靠过往自身的些许经历来判断，实乃小儿科的想法，总是被动，可笑之至。

在我的记忆中，地院五七干校抓“五一六”运动公开全面展开是从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办学习班开始的。也就是说，在干校我是第一个被公开认定为是“五一六”分子的人。而在我之前，虽时有听闻某某已被办学习班了（如陆炎德），但都没有在干校公开过，而是在“暗地里”进行的。而且，所涉及到的人，相对来讲还是少数，只是对个别人在私下里进行着。而自我开始，抓“五一六”就变成一运动的形式在干校全面铺开了。今天某人还人模狗样声嘶力竭地批斗某个“五一六”分子，或像正人君子一样，给某某人办学习班，

当军宣队整人的狗腿子、帮凶和打手；而到明天，他却又成了另一些人的揭批对象或学习班中的新囚徒。这看似笑话，一点没有政治斗争的严肃性，但那确实是地院干校也包括整个地质学院抓“五一六”运动的现实写真。所以当时私底下有人说：洪洞县里没好人，地质学院算烂透了，几乎没有一人不是“五一六”！就好像今天老百姓说贪腐一样：把现有干部抓起来排好队，都毙了会有冤假错案，但隔一个毙一个，则会有漏网之鱼。

当我在全校大会上被宣布隔离审查时，我内心毫无畏惧，也非常淡定。我心中想的只有心爱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因我将在一段时间内无法分担昭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生活压力，也不能陪伴孩子一起玩耍、照料孩子健康成长，我又将对他们母子欠下一笔难于偿还的债务。只是想起他们，我才会有心情沉重的感觉。四十六年后，昭明回忆道——

回干校后的第一天，就匆匆忙忙的过去了。第二天各自分别去班组干活，他仍在采石班，但因已入冬，所以作息时间和大伙一样。我则先把孩子送到幼儿园（来干校前翔雁已办了入园手续），继续在编筐组劳动。因担心孩子不适应（他从未进过幼儿园），中间休息时，我还专门去幼儿园看望他。幼儿园老师看到后，还跟我打招呼说，孩子很乖，送来后没有哭闹，和其他小朋友相处也很好，但比较多的时间是自己一个人玩。听了老师的话我就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我一直担心他不适应在幼儿园里托放，总想找妈妈而哭闹，没想到居然没有，真让我惊奇和喜悦。下午下班后我去接孩子，老师又告诉我，孩子午饭吃的很好，午间睡了一个多小时，也大便了，但有点干，要多给他吃点水果。看得出老师心很细，也很喜欢小牛（孩子的乳名）。我带孩子回家前，特意向她表示了深深的谢意，我为小牛在幼儿园里能遇到一个好的老师而高兴，此后，即使当翔雁被隔离后，她对小牛的照看始终如一，这令我非常感激，只可惜如今再也想不起她的姓名了，我只知道她比我们要略大一些，但愿她一切安好。翔雁回来后，我把孩子在幼儿园的情况也告诉了他，对此他也感到十分快慰，抱起孩子一个劲的举呀、扔呀，孩子就嘎嘎的乐。看到他们父子的欢乐场景，我也乐在其中了。但我又担心万一失手摔着孩子，连忙指责翔雁先去洗洗，换了

衣服再和孩子玩。翔雁知趣的作了个鬼脸，放下孩子后去打水洗脸、洗手了。没想到，当翔雁洗脸时，儿子竟自己走过去站在旁边看，他和翔雁已经熟了，喜欢和他爸疯玩，不怎么粘我了，从而给了我一定的自由空间，让我感到十分快慰。

入夜后，我们很快整理就绪后就睡下了。翔雁父子很快就进入了梦乡，但我却很久没能入睡。我想着我们今天已经开始了正常的干校生活，而且还相当顺利，重要的是大人和孩子都很高兴。如果今后能继续如此，那该多好啊？！即使条件如此简陋，只要我们能过上安安稳稳的日子，全家人不也是乐融融的吗？！

但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前进动力而非以生产力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前进动力的年代，普通人希望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善良愿望，竟是那样难于实现呀！就在我幻想能过上安稳日子后不几天，大约也就是11月13、4号，全干校召开揭发批斗“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动员大会。会上，干校军宣队负责人传达了中央的有关精神，介绍了北京院部的情况和已经取得的成绩，并宣布干校已揪出了“五一六”分子陆炎德，说他已揭发出很多地质学院的情况等。要求大家擦亮眼睛，积极投入运动，并警告所有的“五一六”分子，认清形势，坦白交代。接着就宣布对“五一六”分子宋翔雁进行隔离审查。在我思想上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这一突然宣布让我一愣，接着就看到几个人从会场中将翔雁押离会场，同时骤然响起了“宋翔雁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惯常的口号。很快我就从最初的一愣中清醒过来，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理性地对待眼下的一切，大家都在看着我，一定不要惊慌、不要失态，记住翔雁前几天的嘱咐，不卑不亢处理好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切。与此同时，我一直目送着翔雁被押走的情景，这时映入我眼帘的形象丝毫不像个囚犯，即使不像战士一般昂首前行，但确实是一个对自己充满自信的正直的人那样行走着。当时他被压离会场时的形体语言，让我感悟到，这不仅是他性格的使然——他不会屈从任何有形或无形的压力，没有就是没有，不是就是不是；而且这也是他自身的追求和所信奉的格言的体现——在文革前，当因交友挫折而受到非议时，他曾对我袒露过他信奉马克思说过的一句话：每一种科学批判性的意见，都是我所欢迎的。至于那种不过拿所谓社会舆论作幌

子而我从来不对它让步的偏见，那么，佛洛伦伟大诗人的格言，现在还和以前一样对我是适用的。——“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因此，我信任他，我相信他不是“五一六”。至今，他当时的那种淡定、坚毅的形象也未曾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这也算一份珍贵的记忆留存吧，只是它带给我的却是一份凄惨而痛苦的记忆。

大会散后，我感觉到人们都在看我但却没有一个人和我打招呼。这很自然，因我一下子就“变成”了“五一六”分子家属，人们躲都唯恐不及呢，谁还敢打招呼呢？！而且，国人在只讲斗争的教育下早已养成了落井下石，再踏上一只脚的帮凶恶习，这倒是今后我需要注意提防的。我先去幼儿园接回孩子，到家后屋里空空，顿时让我感到沉重的压力，我不敢让自己停下来，因为今后一段时间里，再也不会有人分担我的家务，我必须抓紧再抓紧。我抱起了孩子，赶紧去锅炉房打水，否则排起长队就受不了了。在等着打水的时候，我琢磨着得做一个孩子的兜兜，这样我就能空出两只手来，拿水壶或买饭。环境逼迫我必须自立，我相信自己定能做到！

二、初级学习班的批斗生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称为“初级学习班”是基于当时干校校部的住房奇缺和修建特点，我的学习班就设于干校党政办公室所在的建筑物内，故干校学员均戏称该楼其为“学九楼”。它既是干校的党政中心所在地，又可能划出数间作为审查“五一六”分子的学习班隔离用房（当我在学九楼被隔离期间，有几个夜晚，曾看到过陈代璋老师在学九楼后边的一栋建筑内的房间内被批斗的情景），甚至还有学生班级上课用的教室。这就决定了在这种条件下办隔离学习班，很难做到犹如监狱那样，达到对外界真正封闭隔离的效果，如隔音、梳洗、如厕等。由于这一建筑物的特殊结构，且它本身又处于干校的中心位置，使得这种学习班无论在批斗和日常管理等方面，还需要顾忌到政策限制，不可能做得太左、太随意，军宣队必需考虑到对外界产生的影响。而且，学习班内的批判、审查交代

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因此专案组对隔离对象采取的各种措施，受条件限制相对就要收敛很多，隔离对象的日子也多少好过一些。在此期间，除疲劳轰炸利用夜晚深更半夜让写揭发交代材料清晨即叫起床外（因房间隔音差，夜晚就不能审讯，更不能责骂批斗，只能用不出声的办法——写材料来惩罚），没有发生过明显的打人、恶意的体罚、饿饭、限制大小便等非人道措施。故称之为“初级”。因此从总体上讲，此时的被审查者除没有人身自由外，尚能过上最起码的人过的日子。

我是在1970年11月中上旬在干校公开抓“五一六”动员大会上，由军宣队指挥蒋喜亭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的。随着话音落下。我即被人从会场带出并押往“学九楼”事前已准备好的隔离房间内听候处理。在押离过程中，会场内此起彼伏地喊起“打倒‘五一六’分子宋翔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宋翔雁必须老实交代”等口号。进至室内后，首先由专案组的头头杜展凯对我宣布专案组的其他人员名单，计有：黄津生、马德跃、周××——地化教研室老师，研究生毕业、李鹤忠等共五人。然后向我宣布了隔离审查期间的相关纪律规定，指出在审查期间，一切都要听从专案组人员的安排。随后就让我先把根据专案组要求由昭明为我准备好的生活用品（衣被、梳洗用具、碗筷水杯、毛选等）安排就位（为便于他们管理，让我睡在上铺），然后自学毛选中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一文，下午结合自己的问题再汇报学习心得。交代完后专案组的人员就都离开了，我则按要求整理自己的床位。面对刚才专案组的乏味布陈，我真觉得无聊至极。但看着昭明为我整就的一件件物品，内心又倍感凄楚，不知她能否经受住这突然降临的这一切？但阶级斗争的残酷现实告诫我，现在不是怜妻想子的时候，需要的是振作、是积极的面对，对即将可能发生的事必须有应对的预案，必须事前确立一些今后自己必须遵守的原则，必须以一个斗/战士而非囚犯姿态面对今后发生的一切。一旦头脑清醒后，我赶紧整理好内务，翻开毛选，尽管杜文在反干扰时就不知看过多少遍，但我还是耐心地看下去，需做好一个对应的准备。在有了一个应对构思后，我将毛选摊开放在桌面上，看似自己在专心阅读毛选的样子，以防专案组人员进屋时说我不专心学习。但这时我心里想的却是专案组的这些人过去

究竟是干什么的，有哪些特点，今后相处中应注意什么？这些人中只有杜展凯以前有过一点接触，知道他原是探工系总支的人事干事，是解放军转业后来到地院的，但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期间，他已调离探工系，但调至哪个部门就不清楚了。因无工作上的交往，彼此只是点头之交，更多为人为事的特点就不知晓了；吴津生，我只知他是调干生毕业于地院，文革前在设备科任职，过去外出借用物品时有过接触，其他方面知之甚微；马德耀，我知道他是勘探系64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辅导员，此前没有任何接触；周××，此前完全不认识，后来得知他是研究生学历，在地化教研室任职；李鹤忠，到干校后才相识，知他是复转军人，摘帽右派，文革前在院机工厂锻工车间工作。当我在采石班劳动时，为打制双抢用镰刀，曾一度在干校锻工作组当过他几天的副手，从而得知他的那点简历，也知道了他有点音乐上的天赋，会拉手风琴，嗓门也不错。由于知道他有当右派的历史，而今竟能从事整人的专案工作，这就给我敲了个警钟，要提防他有极左表现的可能。这点事后证明我没有想错。

在学习班的前一周内，应当承认专案组在言谈举止上、对人的态度上还是比较注意的，当然这都是以要想把我迅速拿下为前提的。在第一周，专案组的工作首先还是让我学毛选的老三篇，但与社会上常说的老三篇不是一回事，结合敦促我交代承认的需要，学的是：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将革命进行到底。每次学习后照例都要让我结合自己的问题讲心得体会。我照例是按主席文章的内容，讲当前对所有“五一六”分子而言所处的就如同渡江作战前夕，国民党反动派所处的形式势相似，只有迅速投降交代，别无出路的大道理。而就我个人而言，我确实没有加入过“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请求组织进一步审查，为了搞清我的问题，我会以积极的态度配合当前的审查。而每次我讲完后，几乎专案组里的每个成员都要大批一顿，内容无外乎就是：态度不老实、想蒙混过关、这样下去决没有好下场等老一套罢了。这种不断重复的学毛选、讲收获、批态度持续了约一周多的时间，在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接下来就改为向我讲当前北京院部和干校抓“五一六”的形势，主要是讲某某交代承认了，某某在交代中对你进行了揭发啦，某某交代后已经落

实政策解除隔离了等等。我记得很清楚的就是，专案组的人很明确地对我说：钱天宇在北京不仅交代了自己的“五一六”问题，还对你进行了揭发，你还在那里死扛什么？好好说说你和钱天宇的关系，把问题交代清楚，看你们谁交代的更彻底些。对这种非常明显的挑动和诱供，非但未能达到让我“反咬”钱天宇一口的目的，反而更让我看清了专案组的虚伪和诈骗。我想他们可能认为我和老钱的关系很好，故想从中进行挑拨（因老钱是在北京探亲期间，接到调回北京院部机工厂，故他委托我帮他将其在干校的行李和各类杂物打包装箱运回北京。由此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加之，文革期间我们又一起步行长征到外地串联，就更加深了他们的这一想法），达到相互乱咬的目的。但他们这只是从表面上看我们之间的关系，却不知我们既非一个学校、同一专业的同学，也非同一时间毕业就职的同事。只是到文革开始后，我们才调至半工半读教研室成为同事的历史沿革。说明我们之间的关系只是很一般的关系，加之文革前他就成家，文革时他已不在大院内居住，所以大串连时，当我从兰考和他分手回到北京后，我们之间基本上就没有什交往了，而“五一六”兵团的出现，恰恰是这段时间之后，怎么可能把我们二人都连到一块呢？所以，我觉得这是典型的骗术。面对这种恶劣伎俩，我十分坚定地回答道：我和钱天宇的关系只是很一般的关系，他是不是“五一六”，我不知道。他承认自己是“五一六”，那是他个人的问题，与我也没有关系。如果他揭发我是“五一六”，那是他在说谎，我们可以当面对质。面对我的这种回答，当然引起了专案组的极大不满，接踵而至的就是把我押往干校的不同班组，接受来自群众的批判，试图以更大的压力迫使屈从。

开始，只安排相对比较熟悉我的连队或班组内批斗，如在五连或相关的班组采石班、木工队、电锯组等。批斗中除了呼喊口号透露点气愤情绪外，其他的发言中除照本宣科念从报刊、文件上抄录下来套话外，几乎很少有针对本人的具体揭发内容。可以说毫无深度和说服力可言。当然在批斗中难免会有些人上台动手按头强迫弯腰的粗暴举动，对此，我的对策是不硬顶，顺其力低头、弯腰，只要你不强压，我就抬起头挺起胸来。既要表明自己作人的尊严，也要避免硬顶可能会造成腰伤，那就不值了。第一轮批斗下来给我的感

觉是，批斗的火力还不如反干扰时强。主要是没有能涉及到我就是“五一六”的实际内容，空洞得很，不像反干扰时，因上级领导定性了反工作组就是反党，我既然反了工作组，就没得好说的了。而现在说我是“五一六”，而“五一六”是反总理的，但又拿不出我在什么时间、什么问题上反对过总理，只凭笼统地说有很多人揭发我，但那是难以服人的。对这类批斗的效果连我这个被批的对象都感觉到没有说服力了，显然军宣队和专案组也会有所察觉。所以，当这轮在我呆过或干过活的连队及班组批斗后，又转入专案组内部写交代、揭发材料、谈认识，并进行专案组内的批斗。但这时的交代揭发越来越没有什么进展了，因为对我来说在文革中的经历就就是那么几件值得一说的事：组织书写反工作组的大字报；反干扰期间被批斗；参加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步行串联和去京西煤矿串联；在原革委会简报组工作；患病逍遥直至军宣队进院，参加教研室内的相关活动至今。再怎么写也就是这些，内容无大差异，只不过是写法按专案组的要求略有不同而已。但在书写材料时我异常警觉，提醒自己用词切记严谨，只说事，少说思。要问想法，可在提问时简要回答。因写在纸上的东西总是记录在案的，若有差错，更正起来就很困难。另一点是，凡与大众公开场合发生的事无关的，能回避的就必须彻底回避，尽量减少事端。面对成心想整人还要置你于死地的操刀手们，不存在竹筒倒豆子的要求，何况我自身没有问题，少说一些的目的在于避免使问题复杂化，而并非说谎。所以有关总部让我找朱成昭劝其检查、带我去解放军报社找肖力、破解川大八二六电报密码等我均没有提及。对他人的揭发我坚持必须是自己亲自看到和听到的，不管它是否已经承认是“五一六”了，绝不去说那些道听途说的或是推测的事情。也就是说，自己揭发的事，必须是经得起检验的。因为当时我的内心还存在一丝想法：只有你说的事能经受起检验，你才能取得专案组的信任，从而改变专案组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说，我内心还是存在着对军宣队、专案组的幻想，还多少有些认为他们是代表党中央来领导运动的，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他们仍是一伙打着抓“五一六”的旗号为名，以镇压文革初期造反派为目的的真实面目。

在经过一段时间专案组内的批判和写交代、揭批材料后，因仍看不到有任何进展，故

后来就又改为押我到其他连队接受批斗。这样做的原由我以为可能有两点：1、所选连队显然被认为是干校抓“五一六”分子比较坚决、得力，在揭发批判上是比较有战斗力的连队；2、因不是一个连队，彼此不甚了解，相互间较少瓜葛，批判者易于全盘接受专案组提供的材料和说法，故能更好地按专案组的意图行事。开始几次全都是在地质系的相关单位进行批斗的，给我印象较深的是岩石教研室的两次批斗。他们采用了与其他部门不同的方式，通过逻辑推理，在揭批过程中以反问的形式要求你立即回答或解释他们的推理是否符合实际？一旦你承认他们所言符合实际、符合逻辑，就转而要求你转变立场老实交代和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分子的事实；如若相反，则猛批你的态度冥顽不化，要转变态度和立场，否则就是死路一条。由于揭批者批斗方式的改变，再用过去我习惯的方式应对显然不合适。所以我在批斗会上精神必须高度集中，要在他们推理分析的过程中，提前预判他们想要引出的结论和问题，并做好应对的准备。譬如，岩石教研室孙桂英老师在批斗中就提到：你在文革中跳得很高，红得发紫，备受重用，是不是事实？面对这一似是而非的含混提问，如果我简单地认可接受这顶“桂冠”，结果必然是，既如此，那这么多人都承认自己是“五一六”，你还能不是？！如果没有勇气承认她的说法不无道理，那就说明面对大家都基本认定的事实你都想回避，岂不说明你内心有鬼，企图隐瞒更大的问题。故我当即认定绝不能对这类抽象说法给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必须拆解成具体问题后再加以回答。而且，所谓红得发紫等说法也绝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察分析事物所应得出的结论，恰恰是过去小市民看人惯用的话语。因此我很从容地答道：我很难回答你这笼统的提问，究竟你说我在什么问题上跳得高了、红得发紫得到重用了？面对我的回答她一下楞着了，显然她想让我顺杆爬的，没想到我反将了她一军。迟疑了一会儿她说道：让你参加中央首长接见并回校传达还不算重用、不算红得发紫吗？这样一来，进入针对具体问题的批判和提问后，就使我不再处于完全被动的揣摩状态，精神上也就不那么紧张了。故对他的提问我很坦然地说道：对，我承认这不仅是对我的重用，也是对我的一次考验——是否真正领会了中央首长的批评本意，是否能忠实于原意不打折扣地向广大师生作传达。事实证明，我经受住了

忠实原意进行传达的考验，原原本本地将中央首长对我们打派仗的批评传达给了大家。但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有什么可“红得发紫”的地方，因为，我觉得让我去听首长讲话，只是想让我更好的接受教育而已。确实当我直接听到中央首长对我们打派仗的严厉批评后，我内心是很愧疚的，所以在传达中我也尽力要把这种情感表露出来。而且对这件事本身，我也从未有过任何隐瞒，在多次交代材料中，我都如实做过交代了。面对我把自己放在接受教育、忠实地进行传达的正确地位，使批判者通过资产阶级观察事物、分析问题的那套手法，让被批者上钩而陷入被动的企图未能得逞，从而使他们精心准备的批斗会只能是无果而终了。反而，在这次批斗中我还接过了孙桂英老师的提问主动出击了一次，使批斗者自吞苦果，也让我很感快慰。这就是当孙桂英说我在文革中跳得很高时，我感到有必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澄清一下自己，防止有人企图把反工作组和抓“五一六”搅合在一起，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且我内心肯定即使军宣队想借抓“五一六”搞造反派，他们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替工作组翻案。所以我说道：在文革初始时，当工作组运动群众圈定黑帮对象时，我确实跳得很高，在探工系发起并写了质问工作组的大字报，还与工作组进行过辩论。但此后，当工作组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后，特别是1967年9月后，我一直因病休息或半休，并以一个普通群众的身份参加院里的各项活动。对于这一过程，我也如实做过多次交代，并未隐瞒。

经过几次这类批斗后，军宣队、专案组也看出没有多大进展，也就很少再组织对我的单独批斗会，而是让我参加校部组织的批斗大会，听取对其他“五一六”分子的批斗，然后在专案组内交代自己的认识和收获。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71年2月底左右。随着春耕时节的到来，又改变了对我的管理办法，即在审查、批判、交代的同时，也押着我去参加劳动，但不允许我与任何人交谈，完全在专案组人员的看管下，干交给我的活。即使这同样没有自由，但我却十分满足，因劳动时我可以和大自然亲密接触，可以晒到太阳，可以看到周围的自然环境和干活的人群，尽管彼此没有言语交流，甚至连目光都未曾有过互视（自被隔离后，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即在外面不管遇到谁，不论相识与否、熟悉

与否，一律不与对方交流沟通。目的有二：一是自防，避免上专案组特意安排的当；二是他防，免得害了别人，给人家惹事。在整个隔离期间，我都坚守了这一规矩），但这也远比成天被囚禁在一个不大的房间内要好上千百万倍。所以，每当要我外出劳动时，我都把这视作我的重大节日，内心之欢畅是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特别是每次插秧后，或后来天气较热了，劳动后出汗较多时，还能允许我去干校边的小溪里好好洗一洗（尽管当时的水还比较凉），这对于几个月来不提供擦洗用水的我来说，可以说是极大的享受了（在学九楼的学习班里，每天只在早晚提供一盆梳洗用水，只能晚间洗完脸后，擦擦身子洗洗脚了事）。说句心里话，当时我还天真地认为，这种边劳动边接受隔离审查不失为是一种较好的审查方式，使被审查者在审查期间多少还能创造一点劳动价值。殊不知，这是军宣队不得已而为之的临时措施。他们已经意识到，我的学习班已经办了将近半年，可以说毫无进展，对我的问题如不加大惩处力度，不加大精神和肉体上的压力，是很难取得进展的。因此，对初级学习班的“升级”也就是在必然了，但我内心却毫无所知，还梦想着能继续边劳动边接受审查呢，简直天真可笑！！

三、妻子的回忆：作为“五一六分子”的家属

自翔雁被隔离后，在编筐组内我就成为被要求揭发和划清界限的对象。每个人的发言无一例外都是要求我揭发翔雁的反革命言行，要我请查并交出他留下的反革命材料，要求我和他划清界限，站到革命群众这边来等老一套的话题。面对这些空洞而又上纲很高的话语，我懒得一一作答，但为了避免无休止的纠缠，我从两个方面铸就了自己的防线。即，1、自文革开始后至67年底以前，我与翔雁之间极少联系，对他在文革中的情况除因反工作组被批斗外，其他方面可以说几乎完全不了解；2、68年起我们来往增多直到结婚成家至今，但我从未听他说起过什么有关“五一六”的只言片语。我自己知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一事也是在开展抓“五一六”运动之后。至于说到材料问题，除毛选外我们没有带任何文

革时期印发的材料，只带了几本数学、力学及学习外语的书，这次还带了一些孩子识字方面的书，此外几乎没有什么文字资料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持，大约也看出我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后，转而时不时的让我跟组里的一些人一起去参加对翔雁的批斗会，美其名曰让我接受教育、提高认识，更好地和宋划清界限。大约又担心我会向翔雁传递情报，故总让我呆在角落里，旁边还围着组里的人。对让我参加这样的批斗会我并不反感，反而觉得一方面可以让我知道一些学习班方面的进展情况，但结果是明摆着的，问题毫无进展，批判还是老套；另一方面，可以让我见到自己难于放下的心上人，起码可以从他的外表，看到他的身体情况。尽管批斗过程中，一些人的粗暴动作令我为他心疼，但不管怎样，我总算得到一次看看自己丈夫的机会。这就是当时的法治状况现实，被判刑在押的犯人都有被探视的权利，相反，一个没有被判刑仅仅是被审查的公民，却完全失去了接受亲人探视的可能。

大约快到年底了，可能出于翔雁的问题仍然没有进展，也可能是因为我不能很好地配合领导的意图，站出来对宋进行揭发批判，所以就对我采取了新的惩罚措施，把我从编筐组调到菜班劳动。编筐组的活相对比较轻，主要是破篾、编筐，个别时要自己外出砍砍竹子，故大多数时间都是坐在凉棚里干活，不但晒不着而且边干边聊，更显得轻松。最紧要的是，劳动地点就在校部内，上下班可以说足不出“户”，上班时带上空的水壶，一下班就先去打水，然后去学九楼后边幼儿园接孩子，这样就可节省很多时间，而这点当时对我是很重要的。因我既要照看孩子又要做饭和整理家务，而且还需搭建未完工的棚子，每天在孩子睡着后，我还要自己一人干很长的时间。尽管当时我是一个负担很重需要给予一定照顾的“困难户”，但那些口口声声喊着动听口号“关心群众生活”的领导，却一纸令下，让我去菜班报到，在那里参加劳动，接受再教育。理由就是工作需要！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对我的一种惩罚。

菜班种菜是一项重体力的农业劳动，当地的老表也都是男性劳力从事。因为种菜不仅涉及到整地、培垄、育苗、间苗、移栽、除虫等细活，还需要浇水、施肥、搭架等。特别

当地是直接使用人的粪便作种菜的肥料，我们需要从公厕将粪便掏到很大的木桶中，然后再挑到菜地附近，倒出制成粪饼，待干涸后再置于菜株的根部。每担大粪少的也约有七八十斤，重的则在百斤以上，还需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这非一般人能够胜任。干校菜班在我去之前只有一名女性，是数学教研室的高德秀老师。因此前与她很少交往，加之我对传言从不感兴趣，对她的情况很少知晓，不知为何罚她到菜班劳动。我去后，菜班就有了两名女性，这样也好，彼此多少能有些照应。

对于菜班的劳动强度我并无畏惧，好强的个性也让我从不害怕与男性比拼。只是挑担行走却让我一下子很难适应，我是北方人而且一直生活在北方，除四清下乡是偶尔挑过一两次水外，基本上没有挑过很重的东西，更没有挑重物走过很长的路程。加之我有平足疾患，空手走长路都有反应，负重而行就可想而知了。而高老师是四川人，加之她已在菜班呆了一段时间，在她的指点下，我很快就“适应”了这项重活，也能挑上八十来斤的担子，行走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正是这种出于政治目的的惩处，再加上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好强的性格及无知，让我今天吃到了苦头。医学科学早就指出，平足不宜负重行走。但因我为了“争口气”，咬牙去拼，结果从前几年开始，我已因双脚脚弓塌陷，而不能久立和行走，必须脚着特制的鞋或加特制的足垫后，方能站立和行走，这给我现在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

菜班的负责人是政治教研室的徐忠，我与他过去没有任何接触，不甚了解。但呆一段时间后，觉得其人还算正直，在平时的劳动和学习讨论中，对我没有太多的苛责、为难和不公。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有些事他也必须得应付，对此我可以理解。但他那油嘴滑舌的腔调和办事作风，我实在听不惯也看不惯，所以不管在劳动中或讨论中经常和他顶撞，有时也搞得他很狼狈，拿我没有办法。在菜班因主要都是男性，所以议论、贬损别人的事较少，再加上我从不偷懒、不嫌脏、不惧难，所以赢得了男性同仁们的尊重，时不时的还劝我少挑点，歇会儿再干等关照的话语，让我内心很感安慰，彼此间的相处反倒比编筐组好许多。所以尽管累些、时间上紧张许多，但心情上相对却要好些，这也算有所失而又有

所得吧！

闯过了菜班初期时的不适应后，我在孩子的照料和生活上的安排都逐渐好转起来，让我坚定了应对更大困难的信心和勇气。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我靠自己的努力还将棚子完全搭好了，所差的只剩下铺放棚顶的茅草，但这只能等到春节放假时再做了，因我需先到低洼处去割茅草，待茅草割够后，方能一次铺就。在搭建棚子时，我和儿子俩苦中取乐，那时他还不足两岁，我就让他充当我的小助手，他还真争气，干的非常好。因搭棚顶的树干需要彼此间用茅草捆绑固定成一个整体，这就需要我站在凳子上才能很好的进行捆扎。为避免经常上上下下，我就将树干、茅草条分别放在靠墙处和小凳上，需要时就让儿子递给我，而且每次他都完成的很好，还不时地喊着：妈妈，还要吗？听到他那清脆的儿音，让我感到浑身似乎流淌着一股透彻、温馨的暖流，舒畅之极！因此，每当我从凳子上下来需要挪凳子换另地方时，我都会抱起他来，使劲地亲亲他的脸蛋。我深信此时的幸福感，是没有经历过当时那种困苦环境的人难于体验到的！

在搭建棚子时，我还发生过一个令人想象不到的笑话，即当需要按尺寸要求截断树干时，需要使用木锯将其锯断，我找出了翔雁自己制作的新木锯，我不知道锯条的锯齿是有方向的，自以为只要反复拉动锯弓即可将树干锯断。结果我把手锯拿反了，向下送锯时挺轻松，反之向上拉锯时，树干哒哒哒的弹跳着，使我的脚都很难踩住它。即使这样也未引起我的注意，丝毫没有发现问题所在，反而自责自己没用，连一根并不粗的木棍都很难锯断！尽管责怪自己无用，但我还是坚持着将需要截断的二十来根树干锯断了，并且把顶棚和门都做好、装上，让打开屋门后，有一个封闭的棚子，既可挡风，又能防雨，心中还是美滋滋的。我的错误持锯方法，直到翔雁解除隔离回到家中后，在一次看他锯木头时，我才发现问题之所在，于是我把自己的上述笑话讲给他听，彼此一起享受着这“劫”后的笑谈，也不失为一种乐闻吧！

适应了菜班的工作后，除了抓紧搭建棚子外，我无时不惦记着被禁闭在学习班的丈夫，如何才能给他一些慰藉，怎样才能让他知晓一些儿子的现况，就成了我经常想到的问题。

开始我只知道他的学习班在学九楼，但具体是哪个房间却难于打探。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他进出房间的大致位置，就正好面对学九楼前面的广场，于是我的主意有了。我决定从幼儿园接孩子出来后，带他先到九楼前的广场玩一会，那里有汽车、拖拉机，同时还有别的孩子在玩，这样我带着孩子在那玩也不扎眼，万一翔雁能看到时该多好呀？！就这样，那段时间只要无雨，几乎我每天都要带孩子在停放手扶拖拉机的地方玩耍近半个小时，并不时回头张望着我估计是翔雁住的那两间房子的窗户，希望能看到点动静。但令人失望的是，因玻璃反光，加之室内很暗，什么也看不出来。尽管如此，我仍坚持这样做，我坚信孩子他爸是能够看到我们的。当翔雁解除隔离回来后怀着激情告诉我，他在学九楼的学习班里，曾多次看到我带着小牛在手扶拖拉机上玩耍的情景，并说非常感谢我的良苦用心。听着这几句出自他肺腑的话，我不仅得到了最好的回报，而且我感到上天的巧安排，是老天爷用他的仁慈让天下所有受苦受难的人们，能够得到最低的心灵安慰！尽管我不信奉上帝，但在这一点上，我的确心存感激，是上帝使我们在孤苦的境遇里也能得到善良受苦的人们极其希望得到的特殊“团聚”。没有经受过这种磨难的人，确实是很难体会到这点的！

在春节前夕，我忙着给孩子换了一身新的棉衣棉裤，为了防风保暖，我还想给他做了一个很厚的屁裢。孩子很快就两岁了，加之又是国人的传统节日春节，我的心愿就是必须把他打扮得和常人的孩子一样，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绝不能委屈了孩子。有一些家长要带孩子去樟树或新余游玩，因我想趁春节假期打些茅草把棚顶苫上，再加上我一人带孩子外出太累，万一孩子出点毛病反倒不好，所以我决定春节哪也不去，多给孩子做点好吃的，带他在附近玩玩，同时割点茅草借机把棚顶苫上。主意打定后，节前我一直挺忙，心情也显得挺好的，让别人感到我似乎一点也没有愁闷孤独感觉。这倒是事先我自己没有料到的，我想，我们没有做过亏心事，尽量不要把悲苦愁闷的心绪挂在脸上或流露在话语言谈之中。因为，此刻我们需要的是真诚的关心，而非怜悯！人在与困难和强势迫害相争时，需要的只能是坚强，再坚强！但人的个性总归会有她脆弱的一面，有时往往会被一些思想

不到的情况所打乱或打破，而使自己短暂地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而犯错误导致后悔不已，陷入对自己的自责甚而会难于自拔。这种情况这次就出现在我的身上，春节那天，我给儿子换上了一身新的棉衣棉裤，戴上了很厚的屁裢。孩子也懂得爱美，穿好后美滋滋地在床上蹦呀跳呀，高兴异常。穿新衣是为了过节，穿这么厚实，是因为我今天要带他出去到湿地边上割茅草，让他一人在坡边干的地方玩，怕他冻着。都准备好后，我带上绳子、镰刀，手牵着他出门了。他穿得多屁裢又厚，他有些迈不开步，抱着他走。到了湿地，我找了一块茅草长的较好的地块，准备过哪去割，并将儿子放在离我割茅草最近的坡地干处，告诉他就在干的地方玩，不许过去找妈妈，那边有水，会把鞋和裤子弄湿的。他听话的点点头，我把给他带的小玩具给他，让他自己在坡地上玩耍，就趟着湿地上的积水，走到我要割茅草的地方。春节时分气温还是很低的，一会儿功夫，在雨鞋里的双脚就已经感到有些凉了，尽管我还穿的是厚毛袜。我一边割茅草一边在回身放下茅草时，看看儿子，嘱咐他不要下坡地，在干的地方玩，他也好好地答应着。割了一段时间后，我看他挺乖的低头在玩，就不再老嘱咐他了。正在我想加快点割茅草的速度时，突然听到儿子大喊一声，回头一看孩子已跌倒在泥塘边，正在往起爬呢。我赶紧跑过去把他抱起，一看他的棉裤、屁裢、棉鞋和棉袄的袖子都湿了，让我既心疼又生气，好不容易有个假期这下就泡汤了。我怕孩子冻着，赶紧拿上镰刀抱起孩子就往家里跑，嘴里还不断地骂着他为什么不听话。自我去北京接他直到如今，我从来没有对他发过这么大的火，可能因此也把孩子给吓着了，他没有哭，也不说话，只是紧紧地搂着我，低声似乎有些胆怯地叫着爸爸妈妈。到家后，我赶紧把他的湿衣裤都脱下来，并在他的小屁股上使劲地打了几巴掌，同时嘴里还不停地说道，让你不听话，记住了没有……。说实在的，当时真想狠狠地打他一顿，让他好牢牢记住。但当看到他那噙着泪水的双眼一个劲地点头，而不敢哭出声来的样子，我的心就一下子全软了，亲了亲他那被我一巴掌打红的小屁股，问他疼不疼，他也只是点点头，没敢出声。这时，我总算真正体会到了“打在孩子的身上，疼在妈妈的心里”这句老话，说的太贴切了。孩子确实被我的发泄吓着了，我不敢再紧耽搁，赶紧拿热水给他擦擦身体，又

给他搓了搓让他发点热后，给他包上被子并放了一个包好毛巾的热水袋，把一瓶热水递给他喝，呵斥他好好躺着不许动。安顿好后，我才把他弄湿的棉衣裤和屁裢拿到外面去清洗，除去泥迹后再晾晒起来。事毕，我回到屋里，看到儿子乖乖地躺着纹丝未动，喝完的水瓶斜倒在他的枕边，两只眼睛直直地盯着我，一声不吭。我看着他又搓了搓双手，然后伸到他的被窝里，觉得挺暖和的，再摸摸他的小手小脚，也挺暖和的，这样我就放心了。这时我的火气已经完全消了，我坐到他对面的床角边上，手伸到被窝里搓着他的双脚，问他为什么不听妈妈的话，不在干的地方玩要跑过来找妈妈，结果把新衣服都弄湿了？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回答道：我是想过去把妈妈割的茅草拿过来放好。听到孩子的这句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是我太粗心错怪孩子了！我立马抱起了孩子亲了亲他，给他穿上原来的旧棉衣服。边穿衣服边对他说，你想帮妈妈做事是好的，但妈妈已经告诉你要在斜坡上干的地方玩，你就要听话。那儿和家里不同，妈妈割茅草的地方都是水，小孩子是不能去的，懂吗？听后孩子又点了点头，他已经能够感觉到我不再生他的气了，依旧靠在我怀里，不急于穿鞋下床，要在平时，他早就张罗着要穿鞋下地出去玩了。我也就依他继续把他搂抱在我的怀里，想着今天自己的大意，对刚才的发泄，后悔莫及。确实因他爸被隔离后他极其懂事，每次我在棚子外剁柴火时（将长的树干剁成长度25—30cm一段段的，以便适应江西当地用的泥土作的小炉子），被剁下来的柴火棍有时会弹出去很远，每次都是儿子跑过去一趟趟地帮我一根根捡拾回来，并堆放在棚子的墙边，码放的很是整齐。这次看我将割下来的茅草，一把把地放在身后，接着又到旁边或前边去割，所以想过来帮把我割下来的茅草捡拾到他玩的地方。他不知道茅草长在湿地，地面有水，所以一滑就跌倒了，反遭我一顿训斥和痛打。对此，显然他会感到委屈，但见我发火，知道自己闯了祸，也就不敢出声了。我搂着孩子，摸着他的头，想借此表达我的自责，给孩子以更多的抚慰。

孩子的委屈完全平复后，我赶紧准备了些吃的，因为今天毕竟是春节，我还到食堂买了肉菜、鱼菜不能亏了孩子。饭后，在孩子睡午觉前，我让他先到外面撒了尿，并把他的小尿盆放在屋角，告诉他起来后只能在床上玩，妈妈要去把早上割下来的茅草收回来，一

定要听话，他答应后就躺下了。说完，我又换上雨鞋，带上镰刀、绳子和扁担，很快朝湿地走去。到后我抓紧又割了些茅草，就赶紧收拾打捆，挑起茅草就往家里走，因我非常担心孩子一个人在家里不安全，害怕出事，即使是不大的事，在当时的环境下，对我都会带来极打的困难。当我赶到家门外，放下茅草担子，进了棚子后，一点儿也听不到屋里的声响，心里还有些忐忑。但当我开门时，就听到儿子问：是妈妈吗？闻声后，一下子我的心就落地了。我高兴地答道：是妈妈呀，你乖嘛？小东西答道：妈妈我乖。进屋后，我看他已从床上站起来，走到床边想让我抱抱。我亲了他一下，说道：等妈妈换了衣服，洗过手再抱你好吗？与此同时，我张开双手，让他看手上的脏痕迹，并让他先坐下等着我。当我换好衣服洗净手把他抱起来时，他那高兴劲就好像几天没见到我一样，我想这大约也是上午委屈后的一种“发泄”吧！春节当天，我们母子俩经过了一场小风波后，总算顺利地度过了。第二天，我先把茅草摊开，让它散些水分，并准备好棚顶用的塑料布，找了几块压棚顶用的木块和石头，准备明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将棚顶苫上。为能及时将棚顶苫好，早上我很早就起来了，先将零散的茅草编排、捆扎成几大片，然后我站在凳子上，将塑料布从棚顶的空格中送出去，再一点点地将其摊开，并用几块木板暂时将塑料布压上，免得被风吹开。正当我准备用竹竿将编排好的茅草排挑几片放到棚顶上时，孩子醒了叫我。我赶紧洗洗手进屋去打点孩子，直到孩子吃完早饭，我让他自己在外面玩，看着我将茅草排一片片的挑上棚顶，并彼此压好，以便雨水能顺利流下来。最后，我将准备好的绳子扔过棚顶，两头再坠上石头或木块，以便把茅草排压实，防止刮大风时吹散。直到午时已过我才基本全部弄完，这下子我们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封闭“能挡风雨”的棚子了。想到今后翔雁看到时也定会满意时，为此我很自得。我深信今后不管遇到多大难处，只要自己坚强面对，都会安然度过的。我不能再多想，赶紧清理一下，洗干净手后给孩子准备好吃的，看着他慢慢地把午饭吃完，而我则随便吃了些昨天剩的东西就打发了。当孩子午休时，我也躺在他的身傍，想着今后的日子，可能因为几天来的劳累，也可能因为一件长期未了的心事——棚子——终于了结了，而使心情松弛下来，我也慢慢进入了梦乡。■

【本刊声明】**本刊声明**

《记忆》创设于 2008 年 9 月，是一份面向民间，面向业余，面向青年的同人刊物。

《记忆》非慈善、非公益。编者尽义务，作者无稿酬。凡认同本刊的宗旨，并取得会员资格者，皆可获得本刊。

《记忆》主张众生平等，凡摆事实，讲道理的文字，无论何门何派，皆可刊发。除特殊情况，《记忆》要求首发。所发文章，不代表编者的观点。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等内容，均受国家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未经著作权人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联系信箱：fxc1966@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

本期编校：方惜辰 杨新敏

本期封面：贺真真

本期版式：续霜红